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

2017 年
现代的中国社会：新看法
(中乌科学家新研究)

Modern Chinese Society - New Perspectives:
New research between China and Ukraine scientists
(2017)

集体专著



书名：现代的中国社 - 新看法：中乌科学家新研究

科学出版电子书

主编：马锋

集体专着的作者：樊平，方宁，何新良，李春玲，马锋，
伊万·精液师，史金波，胡龙西，肖林，孙发平，弗拉基
米尔，毛江晖

ISBN 978-7-5201-0111-0

现代的中国社会：新看法/一万色灭你斯特，毛江晖，孙
发平，何星亮，史金波，等。-- 中文电子出版，2017年

出版：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皮书出版分社(010)59367127

地址：北琪巾北二环巾路 29 酉坑华龙人厦 邮编：100029

网址：www.Ssap.com.cn

字数：3万多

开本：A5

印张：124 千字

版次：2017年十二月三号

语言：中文，英文

皮扞序列号 / PSN B-2012-275-1/1

本朽如有印装质蚩问题，请懵读者服务中心（010-59367028）联系

Abstract

Modern Chinese Society - New Perspectives: New research between China and Ukraine scientists (2017) is a collective monograph of comprehensive, original and farsighted research reports concerning major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issues in economic, social, political, cultural fields of China. The monograph is based on the reports of Chinese and Ukrainian scholars proclaimed by them at the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It offers analysis and scientific forecasts for Chinese socio-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reflects dynamic trends of Chinese socio-economic development in a real and all-around way. This collective monograph is contributed by Chinese and Ukrainian specialists, scholars and authorities who have been engaged in studying socio-economic development of Chinese society for years. It aims serving as a scientific reference for public and social policy-making, and feeding information for research groups, enterprises and the public as well.

目录

- 1 新常态下中国农民的阶层分化：争论和趋势
樊平/ 6
- 2 中国现代化道路四项基本政治经验
方宁/ 23
- 3 中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化的原因及其解决途径
何新良，弗拉基米尔/ 28
- 4 青年群体中的新型城乡分割及其社会影响
李春玲/ 39
- 5 不平等引发的青年激进政治态度及行为
马锋，伊万·精液师/ 54
- 6 中国繁荣和发展传统文化事业的新成就
史金波，胡龙西 / 69
- 7 多维分化的城市社区—基于 CSS 和 CGSS 全国抽样调查数据的分析
肖林/ 75
- 8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积极推动青海与乌克兰共建“一带一路”
孙发平，弗拉基米尔 / 111
- 9 多元共生 和谐发展 - 对青海民族文化发展几
毛江晖，伊万·精液师 / 117

CONTENTS

- 1 The Development Trend of Chinese Peasants under the
New Normal State
Fan Ping / 6
- 2 Four basic political experiences in the construction of
China's modernization
Fang Ning / 23
- 3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principal
contradiction in China and the ways to realize it
He Xinliang, Volodymyr Rezanenko / 28
- 4 New Urban and Rural Division in the Youth Group and
its Social Influences
Li Chunling / 39
- 5 The Radical Political Attitude & Behavior of the Youth
Caused by Inequality
Ma Feng, Ivan Semenist / 54
- 6 China's new achievements in the prosperity and
development of traditional cultural undertakings
Shi Jinbo, Hu Ronxi / 69
- 7 Multidimensional Differentiation of Urban
Communities
Xiao Lin / 75
- 8 Build a community of human destiny
Actively promote the construction of "Belt and a
Road"
Sun Fuping, Volodymyr Rezanenko / 111
- 9 Pluralistic Symbioticism and Harmonious
Development - Understanding of the Development of
National Culture
Mao Jiang Hui, Ivan Semenist / 117

1.

新常态下中国农民的阶层分化： 争论和趋势

The Development Trend of Chinese Peasants under the New Normal State

FAN PING

樊平

提要：中国农民的阶层分化是中国社会转型的重要内容，且在不同阶段有不同特征。农民阶层分化包括向非农产业转化和农民由身份向职业转变升级的高级化和专业化过程。农业经营由强调劳动者积极性转向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农业规模化经营和设施农业对农业生产者素质提出更高要求，也对土地经营方式、生产平台建设、农村生产要素集成和公共服务提高整合要求。农业生产的高级化进程包括职业农民对现代农业的理解和认同，包括由重视农地关系进而重视农业经营的组织形式选择和平台建设。农业生产由以农户经营为主转变为农户经营和规模经营多种形式并存，经营方式由土地

流转加上了农业经营托管。现在中国农民阶层的专业化和身份特征正在承受两种分歧争论。分化还没有达到一个相对稳定和成熟程度,还处在过渡当中。在稳定农民土地关系前提下,在公共服务支持下由传统农户经营向规模经营转变是中国职业农民的发展方向。

关键词: 农民分层 农业现代化 农业服务平台 公共服务 城乡统筹

自 2003 年 10 月中国共产党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城乡统筹以来,中国进入经济社会统筹协调发展阶段,这一时期被称为当代中国后改革发展阶段的“新成长时期”。中国正处在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从乡村社会向城市社会快速转型进程中。农民的阶层分化和社会整合也体现出新的特点,在农民从农业在非农业产业转移的同时,还存在着农民阶层的内部分化和职业趋高级化趋势,即由身份农民向职业农民的转变。传统农户、土地、规模经营、平台支持和集成,农业经营服务市场形成和细化,以上要素的多种组合使农业经营组织形式多样化,使传统的农民定义需要新的完善。当前的争论有利于梳理农民阶层的发展方向和功能。

一、当代中国农民的构成

新成长时期中国农民分化有三个突出特点:一是农民成为当代中国社会各阶层发育的母体。二是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农业生产的经营条件、技术构成与资本构成提高,农业生产开始经历职业高级化趋势,农业生产者由传统经营的身份农民向追求全要素生产率的现代农民转变,农业的规模经营兴起。三是农民分化受各种经济社会因素影响,仍然处在变动中,农村发展平台的支撑集成作用和农村公共服务愈显重要。

村庄生活作为农民阶层分化的活动背景。在上世纪九十年代的当代中国农民分层研究中,随着乡村工业化,农村农民的

阶层分化主要是在村庄社会空间展开,为社区福利最大化为引导目标,且得到国家政策默许,这三个结构化特征会在农民职业进化进程中反复出现。本文使用的中国农民定义包含如下三方面内容:一是身份农民,即国家统计数据的乡村人口。二是职业农民,即乡村人口中直接从事农业生产经营的劳动者,农业劳动是他们的工作方式,农业产出是他们的收入来源,区别于那些是身份农民,有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但已经不将农业生产作为主要工作方式和重要收入来源的乡村人员。第三,中国农民是指经常生活居住乡村的乡村人员,他们的生产生活,他们的家庭成员,他们的社会交往,都发生村落社会。外出就业的农民工如果不返乡务农,不在我们讨论的职业农民和乡村农民范围之内。

城市化水平体现了中国社会在城镇中人口的集中程度。从2000年到2009年,中国城镇化率提高很快,由36.2%提高到46.6%,年均提高约1.2个百分点。城镇人口由4.6亿增加到6.2亿。2008年末,中国城市市辖区地区生产总值占到当年全国GDP的62.7%。城市日益成为中国国民经济活动的主要载体,成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核心力量。快速城市化一方面吸收农民劳动力进城务工,另一方面也全面地汲取农村各类资源,打破了原来乡村社会人际关系和人与生态环境两种生存方式的平衡,改变了传统乡村的社会结构和阶层关系。2008年末,全国乡村人口72135万人,城镇化水平为45.68%;全国镇19234个,乡15067个,全国村委会604285个,村委会数量逐年减少,比1998年119042个减少了近一半。有村民小组480.9万个,村委会成员233.9万人,平均每个行政村3.87名村委会干部。有的学者认为,目前中国的城镇化统计水平有高估取向,因为城镇常住人口统计中包括了在城镇居住半年以上的农村户籍人口¹。也有学者认为,

¹中国社科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所副所长魏后凯2010年07月29日在“《2010年城市蓝皮书》发布暨中国城市发展战略转型高层论坛”代表课题组做主题报告时提出上述观点。

中国的户籍制度滞后于城镇化发展，很多农村户籍的人口和身份是农民的人，其实已经属于城市化或半城市化的城市居民。这涉及农民的充分就业问题。

城市化率反映的是城乡人口的居住环境和生活方式，劳动力分布反映了职业农民规模。从数量上看，中国农村人口和乡村农业从业人口每年都在减少，但是和 2008 年 GDP 的产业结构 11.7:48.9:39.4 相比，第一产业的就业人口所占比例仍然偏大，产出效率较低。2008 年第一产业就业者为 30654 万人，占总就业人数的 39.6%。在 2008 年全部乡村就业人员 47270 万人中，乡镇企业 15451 万人，私营企业 2780 万人，个体经营 2167 万人，还有 26872 万人主要是在农村从事农业生产。上述数据勾划出中国农民的基本轮廓。可以说，2008 年中国存在着身份农民 72135 万人，存在着职业农民 30319 万人，农村人均耕地面积 2.18 亩。据 2008 年农村住户抽样调查，平均每户常住人口为 4.01 人，平均每户整半劳动力 2.85 人，平均每个劳动力负担人口（含本人）1.41 人。

用 2008 年 2 月公布的第二次中国农业普查数据可以详细刻划 2006 年末中国农民阶层的社会特征。第一、农业生产经营户。中国共有农业生产经营户 20016 万户，比 1996 年第一次中国农业普查时增长 3.7%。在农业生产经营户中，以农业收入为主的户占 58.4%，比 10 年前减少 7.2 个百分点。第二、农村劳动力资源。2006 年末，农村劳动力资源总量为 53100 万人。第三、农村就业水平。农村从业人员 47852 万人，占农村劳动力资源总量的 90.1%。其中，从事第一产业的占 70.8%，即 33879.22 万人；从事第二产业的占 15.6%；从事第三产业的占 13.6%。第四、农村劳动力流动。2006 年，农村外出从业劳动力 13181 万人。外出从业劳动力中，在乡外县内从业的劳动力占 19.2%，在县外市（地区）内从业的劳动力占 13.8%，在市（地区）外省内从业的劳动力占 17.7%，去省外从业的劳动力占 49.3%。外出从业劳动力中，

从事第一产业的劳动力占 2.8%；从事第二产业的劳动力占 56.7%；从事第三产业的劳动力占 40.5%。

作为村庄常住人口的村民是一个动态数字，可以用三个方式来估算：第一，用乡村人口减去外出打工者和外出求学人员，农村常住人口为 4.7 亿；第二，按农村第一产业劳动力及抚养人口计算，为 47769.69 亿；第三，2008 年当年完成选举的村选民登记总数为 323548321 人，当届登记选民数 295147598 人，参加投票 268823712 人，委托投票 18351163 人²。村委会选举关系到农村资源管理和土地管理，在农村这是一项重要的权益表达，也是一项重要的社会参与行为。由此可以推算，农村常住人口应当在 4.5 亿左右。

陆学艺（1989；1990）等人的研究按照职业分化把中国农民分为农业劳动者阶层、农民工阶层、雇工阶层、农村知识分子阶层、个体劳动者和个体工商户阶层、私营企业主阶层、乡镇企业管理者阶层和农村管理者阶层八个阶层。这一研究根据课题组的全国城乡抽样调查，采取的是职业分化视角。当时的乡镇企业促进了农民的职业分化，农业经营主要是农户经营。与陆的研究形成参照，西方学者 Walder（2002）根据 1996 年的调查数据，将农民分为农业劳动者、非农雇工、个体经营者、私营企业主、集体企业管理者、村队干部、县级干部七个阶层，他注意到了部分农村精英在政治上的向上流动。

1993 年以来，中国农民阶层分化受到五个因素的影响：一是外出务工农民转变身份逐渐纳入城市制度体系；由上世纪九十年代民工潮城乡往返变为外出农民工成为城市社会常住人口。二是乡村工业化进程受到抑制。乡镇企业经过上世纪九十年代的改制，大多离开农村进入工业园区，留在农村的乡镇企业性质也已改变为私营企业，以前作为乡办村办集体企业时追求社区福利最大化，改制成为私营企业后则追求

² 《中国民政统计年鉴 2009》表 C-30

企业利润最大化。企业用工也不再优先录用本村村民，为了节约工资和便于管理改为雇佣外来人员。三是城市优先发展战略全面汲取农村的资金、劳动力、土地、精英等重要资源，导致农村社区结构肢解，偏远乡村由于年青人大量处出，乡村发展缺少朝气和活力。这在 2003 年以前尤为明显。四是种地由原来的负担变成一种赢利手段。随着 2004 以来政府对农村、农业、农民的一系列扶持和优惠政策激励，农民种地的积极性提高，由以前对农业生产漫不经心变成一项认真算计和能够赢利的产业经营，加上国家对于种粮农民给以生产服务和资金补助，劳动力、资金、技术投入农业生产的力度明显增强。农村土地流转呈规模化，农业生产大户成批出现。五是城乡统筹政策推出，国家对农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的投入力度加强，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免除学杂费，乡村医疗卫生资源和城市医疗体系联网运行，新农村合作医疗减低了农民的负担。

这一系列重要变化影响到农村的阶层分化，受乡镇企业改制、市场化和城镇化影响，农村阶层结构和上世纪九十年代相比有了重要改变，传统的农民进一步分化。

第一，农村进城务工人员。他们在乡村有土地承包经营权和乡村集体资产收益权，但是他们的就业和日常生活已经脱离了乡村生活空间。2010 年以来城市管理体制为他们进入城市社会取得和城镇居民同等身份待遇的门开始打开。在城市务工的他们面临进退两种自由选择：留城或者返乡。当选择权由管制方移交给进城农民时，他们需要认真地比较、算计、权衡，根据自己的预期决定自己的身份归属和利益取舍。进城务工人员及其家属有 2.2 亿人。

第二，经过乡镇企业改制，原来的村办企业管理者和村集体企业职工阶层解体，并入私营企业主和农民工阶层。私营企业往往使用外来劳动力，以前村落社会内部熟人社会帮工换工的习俗，正在为雇佣结算关系所替代。村内的短工服务已经成为村民的一项重要收入来源，计为工资收入。据

2008 年统计, 在乡村就业的私营企业人员 2780.3 万人, 其中私营企业主 440.7 万人。乡村个体就业者 2167.0 万人。

第三, 农业生产者队伍内部发生着变化, 正在经历从传统农民向现代农民的转变。传统农民 (peasants) 是农户经营, 依靠家庭劳动和传统经验积累务农, 主要是自给性生产。现代农民 (farmers) 是按照规模经营方式从事农业经营, 以市场需求调整种植结构, 雇佣农工从事农业, 农业生产的技术构成和资本构成水平高, 主要是市场农业生产。一方面, 单位面积生产中农民付出的劳动时间比以前大为缩短, 另一方面, 现在农业机械化服务相当普遍, 农产品种植指导和产品销售都普遍出现了农村经纪人, 即使是纯农户投入农业生产经营的劳动过程也被分割和替代。2006 年农业普查数据, 农村有农业生产者 33879.22 万人, 其中包括了从事农业服务业成员, 也包括了规模经营的农业大户。私营企业中个体就业者也有部分是从事农业生产。

2006 年取消农业税后, 国家给以种地补贴, 农业规模经营能够获取更大的收益, 农民开始普遍地重视土地产出, 重视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和效益, 一批形成规模经营的农业大户出现, 这是现代农民出现的标志。按中国家庭劳动力从事农业的一般水平, 一个劳动力承包 15 亩称之为标准户。在此规模之上的经营称之为农业大户。随着国家政策提供规模经营, 土地经过流转向种田能手和农业公司集中, 专业的农机经营户和农业经纪人出现, 农业生产和社会化服务体系建立, 农村专业合作社出现, 国家实行种粮补贴和粮食收购保护价格政策, 农业保险也开始试点, 都促使中国农村的农业经营大户产生。

另一种形式是通过农业生产的终端销售环节稳定的价格预期引导农民调整种植品种, 以标准化服务引导农民逐渐改变小农经营的传统种植和管理习惯, 如蔬菜大棚生产, 有机农产品生产, 绿色食品生产, 将设施农业引入农村, 并为农户所接受, 在生产过程中形成了新的生产管理规范和经营规

则。农户与自己承包土地的经营形式没有改变,但是种植条件、种植项目、田间管理、产品销售等经营权已经经过契约转移给了经营公司,农户通过劳动获取的是工资收入。这种生产已经不同于纯农户生产。农产品品牌化营销管理中心的组建不仅在生产上解决了农产品卖难问题,在整个农业生产过程中强化了营销的重要地位,为生产性农业向经营性农业蜕变创造了条件。农业经营和管理现代化提高了土地价值,增加了农民收入,也促进了土地经营规模化。农产品生产的营销引导使农村的小农经营正在经历升级,走向以标准化、规模化、品牌化经营为特征的现代农业。

中国的农村区域发展并不平衡,农业经营大户和农业公司进入乡村规模经营农业更多地发生在东部和中部地区。在西部地区这样的经营结构也有出现,但数量和经营规模都要小。但这体现了农业生产现代化的发展趋势。

第四,农村的文化卫生工作者比以前有所减少。其原因在于,一方面,国家在公共服务和文化服务方面向乡村社会延伸,替代了原来乡村知识分子的部分职能;另一方面,农村的文化服务功能由传统乡村社会功能泛化逐渐向专业化转变,也压缩了原来由乡村知识分子承担的乡村文化服务空间。2008年全国乡村医生和卫生员有938313人,与乡镇卫生院和县级医院建立的医疗服务和医疗费用结算网络。农村村级集体经营的功能普遍萎缩。村剧团的组建也是基于合伙人经营机制,现在乡村的红白喜事也由乡镇和县级水平的专业队伍来承办,民间组织功能萎缩,队伍减少,业务量下降,且这种服务经营也改成为现金结算。农村的文化工作者也逐渐并入乡村个体劳动者和个体工商户阶层。

第五,乡村个体劳动者和个体工商户阶层。和以前相比,有两个类别增长很快。一是为农业生产服务的人,如农机经营专业户、农村经纪人,他们促进了农业的规模化经营。二是农业种植大户,有的已经发展为家庭农场。他们不是纯农户基础上承包土地量的扩张,而是劳动力进行农业生产,经

营性质类似于个体工商户，有的种粮大户经营方式类似于私营企业主。

第六，乡村管理者。这主要是指乡村党支部和乡村村委会成员，即全国行政村 604285 个的基层干部 233.9 万人，平均每个行政村 3.87 名基层组织干部。他们是乡村土地资源的管理者、乡村发展的规划落实者、乡村社会秩序的维护者、广大村民和基层政府的联系人，也成为下乡的农村经营技术和资本与村民联系的联系纽带和中介。乡村管理者面对的乡村工作日益复杂。实行城乡统筹以来，县级以上政府对于农村的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服务投入大量增加，以前的村级自治管理职能已经不适应这一改变。征地程序数量顺序、征地收入分配、农户承包地调整、农户宅基地调整、与乡村集体资产特别是乡村土地资源拥有合法性密切相关的乡村户口和村籍管理，村委会都是直接管理人和责任人。村民对土地资源的重要性和收益十分重视，非常关注，以土地资源和村级集体资产为焦点形成的阶层矛盾、干群矛盾、村民和基层政府的矛盾，关系紧张程度和社会动员深度前所未有。

表 1: 农村居民家庭年度收入比较

项目	平均每人 年纯收入 (元)	工资性 收入	家庭经营 纯收入	财产性 收入	转移性 收入
1990	686.31	138.8	518.55	28.96	
1995	1577.74	353.7	1125.79	40.98	57.27
2000	2253.42	702.3	1427.27	45.04	78.81
2007	4140.36	1596.22	2193.67	128.22	222.25
2008	4760.62	1853.73	2435.56	148.08	323.24

表 2: 按收入五等份分农村居民家庭基本情况 (2008 年)

项目	低收入户	中低收入户	中等收入户	中高收入户	高收入户
平均每人纯收入(元)	1499.81	2934.99	4203.12	5928.6	11290.2
工资性收入	528.66	1095.21	1686.69	2494.84	4525.14
家庭经营纯收入	781.15	1580.11	2169.31	2945.41	5512.62
财产性收入	30.75	45.95	81.53	132.93	534.28
转移性收入	159.25	213.72	265.58	355.42	718.16

农村的职业分层通过收入差异表现出来。通过（表 1）可以看出，农民家庭收入中家庭经营纯收入居第一位，但工资性收入增长幅度快。对 2008 年按收入五等份分农村居民家庭基本收入（表 2）可以看出，工资收入和家庭经营收入对家庭纯收入的贡献率相近。这说明，农村不同收入水平的农户兼业化都是普遍现象。林坚等（2006）综合了已有的中国农村阶层研究成果，以不同职业农民的收入为主要依据，将农民大致分为上层、中上层、中下层和下层四大类，塔尖部分是私营企业主、乡镇企业管理者和农村管理者，约占总人数的 9.7%，他们人数虽少，但拥有较高的收入或组织资源；金字塔的中上层是农村智力劳动者和个体工商户，占总人数的 26.9%，他们人员庞杂、流动性较强，但成员之间的收入差距较大；金字塔的中下层是雇工和农民工，占总人数的 25.3%；金字塔的底部是农业劳动者，占总人数的 34.9%，这个阶层的收入和地位都相对较低；其他占 3.2%。这一研究对农业劳动者的定义在 2006 年以后面临新的形势需要重新界

定。卢福营（2005）针对单一分层标准的争议性，从农村社会成员多元身份的角度提出了综合性分层方法。他认为，农村社会成员内在地包含着三种身份：产权身份、职业身份、社区身份。中国农民的分化体现为这三种不同系列的综合变迁。

二、中国农民阶层分化的进程

研究中国农民的阶层分化不仅要关注价值取向，阶层关系及社会环境变化的综合影响，要注意农村的阶层结构变化和阶层关系特点。

改革开放以来农村的社会阶层结构变化可以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 20 世纪 80 年代。这一阶段中国农村社会变迁的特征是：社改乡镇、联产承包和乡镇企业。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使农民有了生产经营自主权，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迸发出来。上世纪 80 年代人称中国农民富裕的黄金十年，粮食产量和农民收入都创历史新高。同时，小农均质格局的局限也体现出来，农村农业农民需要寻找新的出路。

乡镇企业发展促进了农村的职业分化，乡镇企业的本质是乡村居民、乡村集体直接参与我国工业化、市场化。1978 年农村经济改革前夕，农村非农就业占农村总劳动力的比重不足 10%。这个数字不仅低于国际标准，亦低于中国 1949 年前的水平。计划经济时期的农村工业只是作为农业的附属，而不是一种替代发展战略。直到 1984 年后政府才承认和支持乡村工业的发展并允许城市技术下乡。到 1996 年，农村非农产业的就业人数占到了农村总劳动力的 34%。农村工业化和城镇化发展，改变了农村以血缘和地缘为基础的社会结构；乡村在地工业化提供了多种职业岗位，农民个人的行动空间和流动自由度增加；农村劳动力转移从农业向非农业部门转移，对于流入地来说是要素增加，对于流出地来说是要素生产率增加。职业分化带来的收入多元化和开阔眼界，改变着农村原有的长幼有序的权威结构，使农村以家庭为主要

生产经营单位转变为合伙或者企业经营；乡镇企业也调整了差序格局的利益分配机制，绩效评价成为主导趋势。可以说，乡镇企业发展带动了农村社会的全面变迁。农民富起来，是在实际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后，农村富起来，是在兴办乡镇企业以后。黄宗智指出，在改革期间中国农村劳动力由农业向非农业的转移，逆转了几个世纪以来中国农村的产量增而劳动生产率和收入降的增长格局，并第一次带来真正革命性的转变。（彭玉生：1998）³

这一时期农村社会分化为八个阶层，八个阶层在村落社会都有生存空间，因此这一阶段的农村阶层层次丰富，阶层关系体现为多组关系。这一时期的阶层关系主要表现是：围绕“三提五统”形成的农村干群矛盾；围绕村庄集体经济和集体资产形成的村集体企业与村民的矛盾。前者是农民负担问题，后者是村民自治问题。由于村落内部多组阶层关系同时存在，矛盾的产生和解决在相对独立的阶层关系领域内发生、形成并解决，综合层面矛盾的聚集和积累现象并不是很严重，能够整合农村各种力量集中表达的矛盾并不明显。

第二阶段是 20 世纪 90 年代。这一阶段中国农村社会变迁的基本内容是：农民对社会生活的全面参与，民工潮形成规模；改制后的乡镇企业单纯追求企业利润，丧失了社区内部共同体成员以工业反哺农业的职能；资本对乡村生活的全面渗透，农业生产市场化水平和农村社会生活的货币支付水平显著提高；村民自治成为农村社会的基本制度，村务公开特别是其中的财务公开成为农村干群关系的焦点。80 年代中期农村中比较全面的阶层结构出现了简单化的趋势，农民工外出打工，乡镇企业家进入城镇工业小区，城市扩张开始规模化地汲取农村资源，对农村土地的占用开始形成压力。从 90 年代开始，城镇发展占用农村土地成为农村的主导性社会矛盾，农村基层干部和村民的关系趋于紧张。

³ 彭玉生：“中国农村农业和非农业增长与区域差距”，社会学研究 1998 年第 6 期，第 40-41 页。

第三阶段是“十五”期间。这一阶段全国的城市化进程迅速，城市占用农村土地形成高潮，农村人均耕地面积急剧减少。城市化进程与农村人口就业水平脱节发展，农民从事种植业和养殖业的市场风险增大，农民收入波动大不稳定。城市户口对农民的吸引力降低，农民进城。城市劳动力市场逐步形成，农民工就业竞争加剧，对劳动力的技术素质要求逐步提高。上述几种因素叠加，农民对土地分外珍惜。这一时期农村社会出现了阶层结构简单化和阶层关系简单化。一是乡镇企业向城镇工业小区集中，农民不完全就业比例下降。二是由于乡镇工业向小区和城镇集中，私营企业主、村办企业厂长阶层在村内日常生活和经济生活意义上的阶层互动关系明显减少，这是一个新的发展趋势。农村社会的“私营企业主—雇工”、“集体企业厂长—职工”阶层关系组被瓦解。三是资本和行政权力占用农村土地、占用农村资源的压力呈加剧趋势。费改税后，乡镇财政直接从农村提取丧失了合法性依据，由此导致农村阶层矛盾的新特点就是：阶层关系简化，资源保护意识增强，集体行动的意识 and 力量对于村内占用资源和城市占用农村资源的要求有强烈的排斥感和集体行动能力。加上 90 年代的矛盾积累以及已经经历的周期性收益损失的比较，村落矛盾体现出集中化和规模升级的趋势，村民对占地不满的表达方式集中，力度加大，社会冲突增加。

第四个阶段：城乡统筹阶段。2004 年以来，中国农村阶层发生了两个基本变化，一是农业生产的社会地位和乡村公共服务比以前有所改善，职业农民的地位相对提高。二是农村内部的阶层关系发生变化，身份农民更强调权益认同。

2006 年取消农业税后，国家给予农民种粮补贴，农民种地由以前的负担变成了可以赢利的资产经营。随着市场化进入农业生产产前产中产后全过程，农业现代化进程加快，农业生产对市场的反应更敏感，农户经营的理性决策水平也在提高，农业设施农业、规模农业、休闲农业形成规模，农业生产的规模化经营和设施农业对农业生产者素质提出更高要

求,农业生产开始职业趋高级化进程。在传统乡村的农户分析中,将农户分为四种类型,纯农户,以农业为主的第一兼业户,以非农产业为主的第二兼业户,非农户。这是一个现代化取向的类型转变维度。前类比重越大,说明乡村越具有传统农业性质,后类比重大,说明乡村具有现代农业性质。

这一阶段仍然持续着城市化对农村资源的全面汲取。土地维权成为农村社会冲突的重点领域,土地成为农业利益相关者博弈的核心,这集中体现为村民和地方政府,村民和村委会之间的利益冲突。农民在职业认同之外,强化了村民的权益认同,以此成为社会动员、社会冲突的利益相关者的身份标识。

三、当代中国农民阶层分化的特点

通过对农村阶层构成规模和分化进程的分析,可以概括中国农民阶层分化的几个特点。

一、现在务农农民要清醒认识到农村农业生产的组织机制正在发生重大变化。农业生产者子承父业的就业方式不可能再维持下去了,这对农村就业和农村阶层结构将产生深刻影响。

农业的家庭经营正在向采用先进科技和生产手段的方向转变,提高集约化水平。一个是通过土地流转发展规模经营,提高劳动生产率;另一个是发展设施农业,提高土地产出率。相比分散经营,农业经济规模化经营有六个好处,省农机、省劳力、省资源、降成本、提品质、提效益。种粮专业大户实现了科学管理和生产要素的优化组合,产生了规模效益。据农业部数据,2008年中国一村一品专业村达到4.3万个,占中国行政村总数的6.8%,经济总收入达到1.2万亿元;专业村农户数为1900多万户,占到中国农户总数的7.8%;专业村农民人均纯收入5085元,是中国农民人均纯收入的1.2倍。从收入上我们看到了农民内部的分化加剧,从现代农业和规模经营上则可以看到在生产方式、生产条件、生产环境上传统农业与现代农业、传统农民与新型农民的异质性。

农民的收入增长也不能只依靠农产品产量增长,而是要依靠单位农户经营的土地规模的增长。土地规模的增长又要依靠其它农户从农业生产领域中退出,因此解决农业问题的根本出路是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发展理念上由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升级,发展方式由大田农业向设施农业升级,发展策略由分散经营向组织化集约经营升级,发展主体由传统农民向新型农民升级。

二、要关注农村劳动力从农业向非农业转移的推力—拉力研究。

在现代化进程中,农村人口和农业生产人口减少是必然趋势。城市化进程对于农村人口的吸引和农业生产结构升级对劳动力需求的减少,形成农村人口转移的拉力和推力。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乡镇企业发展转移农村劳动力是拉力为主,进入新世纪,农业生产趋高级化带来的农业生产者再分化,农业生产结构和组织机制的调整使村落内部农业经营方式调整的推力居于主导地位。在拉力为主条件下,农民的职业流动是一种主动选择,选择不流动也可以保持自己的阶层地位不变;在推力为主条件下,村民的社会流动就可能是一种被动的裹胁型的下向流动,存在着被农业生产过程排挤的风险。

三、要重视失地—失业农民问题。

失地农民主要是城市近郊的农民,以及工程项目占用了土地的村民。对失地农民现在还没有权威发布的统计数据。他们中的一部分人融入城市,脱离了农民身份;他们中还有一部分人不能被城市社会保障有效覆盖,也没有了土地资源。他们一般不会轻易放弃土地,对于土地的争夺和捍卫成为近年来社会冲突的焦点。他们是近年来乡村社会矛盾和城乡社会冲突中的焦点人物。世界银行的研究表明,当人均 GDP 小于 500 美元时,农民以分散的自给自足方式经营土地;当人均 GDP 大于 1000 美元时,农村土地的市场价值才开始体现出来,表现为土地拥有者转移土地的强烈意愿。在改革开放的 20 年中,有两万亿以上的土地出让金用于城市的建设,

而这两万亿的土地出让金进入城市并没有带来相应比例的农村人口向城市稳定转移。

四、对农村集体资源和集体资产的管理。现在农户、企业层次的权益关系相当清晰，但对农村集体资产的收益权和分配权还有进一步完善之处。根据现行的中国土地法律制度，农村土地属于农民集体所有，村民享有土地承包经营权。问题在于，谁是“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或者“村庄”的成员？具备什么样的资格才能成为此种组织或村庄的成员？法律对此没有明文规定。一般理解是，以户口所在地作为界定一个人是否具有某村庄成员资格的条件。2006年制定的《广东省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管理规定》就强调了以户口为原则的标准。问题是，如果承认一个人只要具有某个村庄的户口即可享有土地承包经营权，已经成为农村土地纠纷的难题，农村户籍也不是村委会和村民大会所能够决定和管理的。现在，人们的户籍“身份”变化的可能相当大，给土地权利的界定带来困难，在村庄管理和村民权益之间造成大量冲突和纠纷。在土地问题上集中表现出农村阶层矛盾的新特点：阶层关系简化，资源保护意识增强，利益相关者对于村内占用资源和城市占用农村资源有强烈的排斥感和集体反抗能力，这已经直接影响到中国农村的社会整合和社会秩序。

分散经营且超大规模的小农户如何进入现代化，和其他居民共同享有社会发展成果，是决定中国社会发展的根本性问题。要使农民摆脱贫困，国际经验之一是以农业规模化、产业化解决分散的不规模经济的问题，使几亿农民在较短的历史时期内摆脱贫困，以较低的社会代价进入现代发展状态，这意味着中国在统筹城乡发展条件下探索自己独特的农村现代化之路，这就需要在城市化、市场化的视角之外，还要有农业现代化的视角，还要有农村发展的视角。农村阶层地位的排列位序还在调整过程中，中国农村社会阶层分化还没有达到一个相对稳定和成熟的程度。中国农民阶层分化的复杂

性, 说明现实中的社会分层系统受职业选择和社会支持系统多个分层过程所组成, 忽视这种多样性无助于对中国农民社会分层问题的研究。从世界发展史看, 农业在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和积累要依靠一批从小生产者分离出来的中产阶级, 他们有实现农业现代化的愿望和实力, 这个条件在中国也是一种发展的必然。随着农用地流转制度建立和耕地相对集中, 农业劳动者将逐步成为真正独立的现代农业的经营者, 不再是传统的小农, 与非农领域中的中小业主以及其他自营业者一起成为社会中间层的组成部分。

参考文献:

Walder , Andrew : Income Determination and Market Opportunity in Rural China , 1978-1996 , 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 30, pp. 354-375, 2002.

李培林: 《村落的终结——羊城村的故事》. 商务印书馆, 2004.

林坚等: “我国农民的社会分层结构和特征——一个基于全国1185份调查问卷的分析”, 《湘潭大学学报》2006年第1期。

卢福营: 《非农化与农村社会分层: 十个村庄的实证研究》, 中国经济出版社, 2005年。

陆学艺: “农民的分化、问题及其对策”, 《农业经济问题》1990年第1期。

陆学艺: “重新认识农民问题——十年来中国农民的变化”, 《社会学研究》1989年第6期。

毛丹: “村落共同体的当代命运: 四个观察维度”, 《社会学研究》, 2010(1): 1-33.

2.

中国现代化道路四项基本政治经验

Four basic political experiences in the construction
of China's modernization

方宁

Fang Ning

经过不断的实践探索，中国在过去 40 年逐步发现和采用了一种独特的发展路径，并成功地将中国引向了工业化、现代化。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功可以概括为四项主要的经验，它们也是 1979 年确定的改革的策略与路径选择包含的制度变迁逻辑的历史展开。

1、在经济社会发展进程中，把保障人民权利与集中国家权力统一起来。

中国改革在实践中的具体内容首先表现在改变计划经济以及“文革”中的做法，给人民以自由与权利。保障人民权利的价值在于以制度形式建立普遍的社会行为规范，并进一步形成经济活动预期，激励民众从事生产和创造性活动的积极性、主动性，这是世界各国工业化、现代化的普遍经验。

中国的改革实践也体现了对广大人民群众经济社会权利的保障,新中国成立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民的基本权益得到了普遍保障,中国取得了举世无双的经济发展和进步,创造了人类工业化的奇迹,使占世界人口近五分之一人口摆脱了贫困,向着全面实现小康社会的目标迈进。

中国改革在广泛保障人民权利的同时,还有另一方面的机制,这就是中国政治制度与体制具有集中资源的功能,包括调控市场经济行为、制定经济发展战略规划、协调区域发展、推动基础设施建设等。以共产党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为基本内容的政治制度,提供了保护权利和集中力量的双重功能。

世界各国工业化的历史过程中会产生两种社会激励机制:一种是分配性参与,通过选举、政党、政治,去改变分配规则、重新洗牌获取社会利益;另一种是生产性激励,促进人们通过生产经营活动,实现社会及个人的发展。现代资本主义政治体制具有一定程度权利保障的功能,但同时开放性选举,造成了扩大社会分歧以及政党、利益集团相互排斥攻讦的“否决政治”的困境。在富裕稳定的西方国家,这些弊端还能控制在一定范围和程度,而对于那些处于工业化、现代化进程中社会矛盾多发期的发展中国家,西方政治制度的缺陷表现得尤为突出。在工业化阶段的社会矛盾多发期,以竞争性选举为社会矛盾的爆发点,许多发展中国家“一选就乱”,导致了频繁的政治冲突,有的使社会陷入长期动荡。实践表明,西方式的政治制度存在着重大内在缺陷,尤其不适于广大发展中国家。

(二) 在工业化阶段,选择协商民主为民主政治建设的主要方向和重点。

考虑到中国当前的经济社会条件、面临的主要任务以及国际环境,也考虑到西方国家以及一些发展中国家民主政治发展的经验教训,中共“十八大”将协商民主确定为现阶段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方向和重点。

中国现阶段政治发展的一大特点正是以协商民主作为实施和发展民主政治的主要形式。中国的协商民主是覆盖社会各个阶层群体,运行于政党、国家、社会、公民各个层面的民主治理体系。中国在工业化阶段重点发展协商民主的主要价值在于:

其一,有利于减少社会矛盾,扩大社会共识。竞争性的选举民主形式由于具有强化社会分歧和“赢家通吃”效应,容易造成利益排斥。这也是当下西方民主引发质疑的重要原因之一。而协商民主的本质是寻求社会利益的交集和最大“公约数”,照顾各方利益,促进妥协和共同利益形成。

其二,有利于提高民主质量。协商民主与选举民主、多数决定的民主机制不是对立的,协商民主可以让各种意见充分发表,在交流讨论中取长补短,避免片面性,尽可能趋于一致,也有助于把“服从多数”和“尊重少数”统一起来。

其三,有利于提高决策效率,降低政治成本。竞争性选举民主的前提是公开竞争与辩论,缺点是把分歧与矛盾公开化,使具体问题抽象化、原则化,形成价值对立和道德评判,提高了达成妥协与共识的交易成本。而协商民主是求同存异,一般情况下回避尖锐矛盾,不公开分歧,有利于达成妥协和共识,降低达成妥协的交易成本。

(三) 随着经济社会发展进步,循序渐进不断扩大和发展人民权利。

西方世界的权利观,或认为权利是先验、与生俱来的,即所谓“天赋人权”;或认为权利是法律赋予的,法定权利神圣不可侵犯。但西方自身政治发展的经验证明,权利的实现是长期的社会进程,宪法和法律的确立仅仅是权利的起点而非终点,宪法和法律本身就是一部权利实现的历史。以美国为例,美国以奉行和倡导自由平等精神立国,但在美国宪法中却保留了奴隶制。在美国建国 80 多年之后,美国通过宪法修正案方式才在宪法层面否定了奴隶制。而在美国被宪法确认的公民平等原则全面转化为各个联邦主体即美国各州

的法律时已经是上世纪 60 年代的事情，这意味着美国的宪法原则落实为法律走过了上百年的道路。美国历史表明权利的实现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而当今世界上，许多照搬西方以及美国政治制度的发展中国家遭遇了“民主失败”，一个重要原因是人民权利的扩大超过了政治制度和体制的承载能力，形成了权利超速现象。

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实践以及中共的官方意识形态中，从未把权利神圣化、绝对化，从未以先验的、教条主义的态度对待人民权利问题。权利是伴随经济、社会、文化的发展而不断扩大和增长的，而非与生俱来或单纯靠政治斗争争取来的。人民权利需要宪法和法律的确认和保护，但法定权利从文本到实现是一个实践过程。权利是历史的、社会的、现实的，具备条件的情况下才有可能享有相应的权利。

中国共产党人所倡导的权利观的根本之道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通过不断促进经济、社会、文化发展来为人民权利的发展创条件，逐步地发展和扩大人民的权利。这是中国在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在人民权利意识不断上升的复杂的社会环境中依然保持社会稳定的重要的经验之一。权利保障的进步首先体现在司法保障方面，其次是逐步完善利益协商、利益保障、诉求表达、矛盾处理等利益协调机制。

（四）在民主政治建设和政治体制改革中，采取问题推动和试点推进的策略。

政治体制改革是浩繁的社会工程。从比较理想的状态设想，应预先准备和计划，然后付诸实行。但“顶层设计”需要在同一领域足够经验的基础上形成科学理论，而在社会领域，尤其政治领域，实践对象的重复性低，又不能像自然科学和工程学那样人为制造相似环境进行实验，所需要的条件往往难以满足。法国大革命后《人权法案》、美国独立建国后创制美国宪政体制、新中国一系列政治制度等，都是重要的“顶层设计”和实施，但都产生于新旧制度更替的革命年

代。而改革是在原有基础上的变动与完善，必须面对既有制度、既定格局等因素，被束缚于客观的规定性之中。

中国实行改革开放以来，根据自身实践和长期探索形成了推进改革和政治发展的三大策略：

一是“问题推动”。从现实中的问题出发，从实际问题中选择突破口，实为明智之举。解决了现实问题，证明做法的正确和取得了初步成功。积小胜为大胜，可以减少因主观认识的局限和判断失误带来的风险。

二是“试点推进”。试点是用实践检验政策和理论的方法，可以给人们纠正错误的机会，具有分散风险的作用。政治建设和政治体制改革最忌“一揽子”方案，一旦失误，满盘皆输。经过试点就不会有大错，即使是出现设计错误，甚至改革的失败，也会把风险和损失控制在试点范围内，而避免了更大的全局性、颠覆性的错误。

三是“统筹兼顾”。政治问题“牵一发而动全身”，政治建设的局部成功未必具有很大的价值，有些政治建设与改革可以带来某一方面的效益，但却可能在其他领域引发新问题。因此，政治建设和政治体制改革重在评估其整体的效应。通过不断的局部实验与试点，可以观察和评估其整体效果，最终形成全局性的稳妥的解决方案，形成比较成熟完善的政治制度。

中国的改革开放进程中形成的“问题推动”、“试点推进”和“统筹兼顾”三大策略，保证了中国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平稳的工业化、城镇化发展进程。对比西方历史上以及发展中国家在现实中因工业化引发的灾难性的社会冲突与动荡，中国的改革开放以及工业化、现代化进程堪称奇迹。

3.

中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化的原因及其解决途径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principal contradiction in China and the ways to realize it

何新良, 弗拉基米尔
He Xinliang, Volodymyr Rezanenko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
国务院参事、全国政协委员
何星亮

2017年12月

- 一、中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化的历史过程
- 二、新时代主要矛盾转化的原因
- 三、如何解决新时代的主要矛盾？

内容提要

本文第一部分分析新中国成立以来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主要经历了五个阶段:一是新中国成立之初,把阶级矛盾和社会主义与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看作是主要矛盾;二是从1956年至1966年的10年间,把现代工业与传统农业、经济文化发展不能满足人们的需要看作是主要矛盾;三是1966年至1976年的十年的文化大革命期间,把阶级斗争看作是主要矛盾;四是1978年至2017年,把“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看作是主要矛盾;五是新时代的社会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

本文第二部分分析新时代主要矛盾转化的原因:一是因为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不只是物质方面的需要,它包括物质性的需要、社会性的需要和精神性的需要;二是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是“日益增长”的,是由低层的向高层次不断发展的。

第三部分分析解决新时代的主要矛盾的途径:一是把“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的需要”作为各项建设的动力和源泉;二是各项建设由“以物为本”转向“以人为本”;三是各项建设之间和地区之间平衡发展;四是满足国内需要和国外需要相结合,构建合作共赢、共同富裕、共享发展的人类命运共同体。

十九大报告宣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新时代的总目标是在本世纪中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新时代的社会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并强调“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是关系全局的历史性变化,对党和国家工作提出了许多新要求。我们要在继续推动发展的基础上,着力解决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大力提升发展质量和效益,更好满足人民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

态等方面日益增长的需要,更好推动人的全面发展、社会全面进步。”

新中国成立以来,社会主要矛盾经历几个阶段的变化?新时代主要矛盾的原因是什么?如何解决新时代的主要矛盾?本文就这些问题谈自己的认识和理解。

一、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化的历史过程。

任何一种社会,自身包含多种矛盾。在各种矛盾中,有主次、轻重之分。处于支配地位、对社会发展起决定性的作用称之为“主要矛盾”。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随着社会的发展而不断变化。

(一)新中国成立之初,把阶级矛盾和社会主义与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看作是主要矛盾。

新中国成立前夕,党中央就开始分析新中国成立后的社会主要矛盾。毛泽东在1949年3月召开的七届二中全会的报告中指出:“中国革命在全国胜利,并且解决了土地问题以后,中国还存在着两种基本的矛盾。第一种是国内的,即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第二种是国外的,即中国和帝国主义国家的矛盾。”1953年12月,在中共中央批准并转发的过渡时期总路线学习和宣传提纲中沿用了七届二中全会关于国内主要矛盾的提法。

(二)从1956年至1965年的10年间,把现代工业与传统农业、经济文化发展不能满足人们需要看作是主要矛盾。

1956年9月,党的八大第一次明确阐述了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我们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

(三) 1966年至1976年的十年的文化大革命期间,以阶级斗争为纲,把阶级斗争看作是主要矛盾。

(四) 1978年至2017年,中共把“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看作是主要矛盾。

十一届三中全以来,不再强调以阶级斗争为纲。1979年,在中央召开的理论务虚会上认为中国的主要矛盾不是阶级斗争,而是“我们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很低,远远不能满足人民和国家的需要,这就是我们目前时期的主要矛盾”。

1981年6月作出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在剥削阶级作为阶级消灭以后,阶级斗争已经不是主要矛盾。”并强调:“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我国所要解决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

1982年的十二大报告没有明确提出主要矛盾。

1987年的十三大报告指出:“我国正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并指出“我们在现阶段所面临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

1992年的十四大报告强调“现阶段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

1997年的十五大报告再次强调,我国社会主义社会仍处在初级阶段。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个主要矛盾贯穿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整个过程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

2002年,中共十六大报告指出:“我国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现在达到的小康还是低水平的、不全面的、发展很不平衡的小康,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仍然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

2007年,中共十七大报告重申:“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一社会主要矛盾没有变。”

2012年,中共十八大报告指出:“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一社会主要矛盾没有变,我国是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没有变。”

(五)新时代的社会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

二、新时代主要矛盾转化的原因

如何理解十九大报告提出的“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的需要”?如何理解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

我个人认为可以从三个方面来理解:

(一)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包括物质性的需要、社会性的需要和精神性的需要。

改革开放以来,强调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也就是主要强调物质生产,目的是解决温饱问题。

人类的需要是多样的,物质文化或物质性需求仅是其中一种。从需求性质的角度而言,人类的需要大致可划分三大类:

1、物质性的需要。

物质性需要或生理性需要,是人类基本的需要或本能需求,是人类第一层次的需要,是人类为满足人体饮食、消化、生殖、皮肤等各部分器官正常活动的需要,也就是人类为满足“求生”、“求偶”的需要,亦即涉及人类生物意义上的生存性需要,如食物、衣服、住房和种的繁衍等。也就是说饮食、结婚生子及穿衣住房等,是人类生存最基本需求。人类的经济生产或物质生产,主要是满足人类的生理性需要的

生产。

2、社会性的需要。

社会性需要是在物质性或生理性需要基础上形成的，可以说是第二层次的需要，它包括社会安全、社会保障和社会公正等方面的需要。

(1) 社会安全需要：一是生命安全，人们都希望保障自己的人身安全、家庭安全，希望避免人身伤害和处于危险的境地，希望居住在安全有保障地区；二是财产安全，希望个人财富或家庭财富不受侵犯；三是食品安全，希望社会提供对人体无害、无毒的食品；四是药品安全，不希望买到假药或质量有问题的药品；五是空气安全，希望能够呼吸到清新的空气，希望天天都是没有霾的日子。

(2) 社会保障的需要：一是工作保障的需要，人人都希望有合适的工作和稳定的职业，并有失业保险和退休福利等；二是教育保障的需要，希望受到较好的教育，希望能够上得起学并交得起学费；三是健康保障的需要，希望避免疾病和死亡，希望有病能治并能看得起病。

(3) 社会公正的需要。一是希望社会是公平正义的有序社会，希望是制度化、规范化、法治化、程序化很高的稳定和谐的社会；二是办事和执法公正，人们都希望自己的政府是公正、清廉、阳光的政府，都希望政府官员是清官，希望各级官员能够不偏不倚，公正地办事，公正地执法；三是分配公正，人们都希望分配公平合理，都不希望贫富差距过大，都希望共同富裕、共同发展；四是干部选拔公正，希望不买官卖官，不拉关系，不走后门，按各人的才能合理安排职务，使人尽其才。

3、心理性的需要。

心理性需求是体现人与自我或心灵之间关系的需求，是人类第三个层次的需要，由于心理性需求而形成的精神文化，是人类社会区别于动物世界的显著标识。动物只有对物质的需求，而没有对心理或精神的需求；动物的活动和需求都是

本能的，而人类的活动和需求则是充满创造性的。正是人类这种在物质需求之外对精神、价值、道德、理想、艺术、信仰、尊重、自我实现等的需求，催生和孕育了不同于物质文化的另一种文化形态——精神文化。

（二）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是“日益增长”的，是由低层的向高层次不断发展的。

人类的需求是由低层次向高层次不断发展的，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的需求越来越高，越来越多元化。例如，改革开放以来，人民的物质性需要也不断发展，温饱问题基本解决后，人们便追求舒适、高层次的物质享受。在改革开放之初，人们主要解决温饱问题，人们追求的是手表、自行车和缝纫机三大件。到 20 世纪 90 年代，人们追求的电视机、洗衣机、冰箱三大件。进入 21 世纪以来，消费欲望上升为房子、空调、汽车新三大件。

人民的社会性的需要也是“日益增长”的。改革开放之初，大家没有什么财产，大家都很穷，大多数人没有多余的现金、没有房子、没有存款、没有股票等，也就没有财产安全的需要。至于食品安全、药品安全和空气安全等，大家都没有这种概念。社会保障需要也一样，可以说是从无到有，逐步建立各种制度，满足人民对工作保障、失业保障、退休养老保障、教育保障、健康保障的需求。人们对社会公正的需要也是不断增长的，由低到高，不断增长。

心理性需求也一样，由低层次向高层次不断发展。例如人们对艺术的需要日益增长，艺术的需要主要满足目、耳、鼻等的需求，人人都喜欢目视美色，因而产生美术、舞蹈等造型艺术和表演艺术；人人都喜欢耳聆妙音，因而产生音乐、文学艺术等；人们喜欢鼻闻异香，因而产生种植香花等园林、盆景艺术。改革开放之前，这些需要是低层次的，现在都喜欢高层次、高雅艺术，如高层次的音乐、舞蹈、戏剧，收藏高档的字画和各种艺术品等。

三、如何解决新时代的主要矛盾？

如何解决新时代的主要矛盾？笔者认为，应从如下几方面着手。

（一）把“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的需要”作为各项建设的动力和源泉。

近 10 来，人民高层次的物质性、社会性和心理性需要不断增长，人们都希望国家和政府提供高品质的物质产品，希望有一个安全、稳定、和谐、绿色、生态的居住环境，希望有一个“人能尽其才，地能尽其利，物能尽其用，货能畅其流”社会环境，希望有一个政治民主、政府清廉、办事公平、执法公正、反腐倡廉、风清气正的政治环境，希望国家和政府满足人民高层次的精神生活需要。

2012 年 11 月 15 日，在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当选的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采访十八大的中外记者亲切见面时说：“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各级党政部门和企事业单位应切实了解当前人们的各种需求，深入了解当前人们的物质性、社会性和心理性需要是什么？不断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需求，把人民的各种美好生活的需要作为各项建设的动力和源泉。

（二）各项建设由“以物为本”转向“以人为本”。

改革开放之初，为了解决温饱问题，以物质生产为核心是完全正确的。以物为本就是物质生产第一，产量第一，GDP 第一，项目第一，招商第一。许多地区不考虑环境和资源成本，采用拼体力、拼环境、拼资源的方式来实现增长，这就形成了低消费、高消耗、恶环境、产能过剩等非科学的发展，从而造成投资率趋高、行政开支加大、公共福利短缺等不良现象。经济发展了，人民生活也改善了，但贫富差距越来越扩大，腐败问题越来越严重，食品越来越不安全，房

价越来越高，民众越来越不满。今后的发展，应该由“以物为本”转向“以人为本”，以人的幸福、安全、健康等为根本。多生产高质量、绿色、健康食品，多提供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能源；多建宜于人居的生态环境，多建环保安全的而又能够使普通人能够买得起的住房，采取措施使城市没有霾；逐步扩大养老、医疗保险、教育保险范围，提高低保标准，使大多数人少有所学，老有所养，病有所医；加大力度改革收入分配制度，缩小贫富差距，以促进社会稳定；“完善基层民主制度，保障人民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满足人们对政治民主的需求；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华民族精神和公民道德等，建立国家共识，建立人文精神和伦理道德新秩序；弘扬诚信、仁爱、友爱的品德，保障人的尊严与幸福；提升人的科学意识、理性意识、竞争意识、创新意识，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三）各项建设与地区之间平衡发展。

十九大报告强调，新时代的社会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如何理解“美好生活需要”与“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

人类社会普遍追求各种关系的平衡，如人类社会与自然界的平衡，供给与需求的平衡，生产与消费的平衡，收入与支出的平衡，中央与地方的平衡，地区之间的平衡，经济建设、政治建设、社会建设、文化建设和生态建设的平衡，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的平衡。平衡是健康的，不平衡是病态。只有各种关系处于平衡状态，社会才会均衡和谐运行，经济生产才会可持续发展。

在新时代进行现代化建设，必须注重主要矛盾与各种建设的平衡关系，也就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建设的平衡关系。中国当前存在的许多问题，与供求关系、产销关系、

结构关系、利益关系、地区关系等不平衡、不充分密切相关。加快现代化建设,复兴中华民族,实现中国梦,必须注重各种关系的平衡。不断满足“人民日前增长的美好生活的需要”,也就是解决供需失衡、产销失衡、产能过剩等问题,也就是解决地区之间、经济结构之间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

处理好各地区、各项建设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有利于当前正在推进的供给侧改革,有利于解决当前存在的供需不平衡、产销不平衡问题,有利于防止我国走入“中等收入陷阱”,有利于推动我国经济可持续发展,有利于实现新时代的总目标和总任务。

(四) 满足国内需要和国外需要相结合。

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既要立足国内,也要走向世界。推动经济、社会和文化的可持续发展,既要通过不断满足国内人民的日益增长的需求,也要通过满足世界各国人民日益增长的需求来实现。

梁启超在 1901 年写过《中国史叙论》长文,把中国历史分为三个阶段,或者叫三个中国的时期,秦之前是“中国之中国”阶段,秦之后是“亚洲之中国”阶段。19 世纪(1793 年以后)以后是“世界之中国”阶段。梁启超还义为,复兴中华民族,并不是只考虑本国富强,而且还要给全人类带来幸福,他说:“一个人不是把自己的国家弄到富强便了,却是要叫自己国家有功于人类全体。不然,那国家便算白没了。”“我们人数居全世界人口四分之一,我们对于人类全体的幸福,该负四分之一的责任。不尽这责任,就是对不起祖宗,对不起同时的人类,其实是对不起自己。”

当代的中国是“世界之中国”,当代世界是开放、互动、包容的世界。构建合作共赢、共同富裕、共享发展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开放包容、物质丰富、文化繁荣、清洁美丽的世界,既是中国人民的需要,也是世

界各国人民的需求。我们既要满足本国人民的需求，也要满足世界各国人民的需求。我们不仅要把我国建设成为现代化国家，而且还要帮助世界上发展中国家建设成为现代化国家，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人类社会的文明进步作出自己的贡献。

综上所述，实现新时代的总目标，必须妥善解决新时代的主要矛盾，解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经济建设与人民的物质需要平衡发展，社会建设与人民的社会性需要平衡发展，文化建设与人民的心理性需要平衡发展。既要满足人民高层次的物质性需要，也要满足人民高层次的社会性和心理性需要，只有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三类需求，人们才会感到幸福美满，社会才会和谐稳定，国家才会繁荣富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才有可能真正实现。

4. 青年群体中的新型城乡分割及其社会影响

New Urban and Rural Division in the Youth
Group and its Social Influences

李春玲
Li Chunling

摘要

户口制度改革的推进，使得原来的城乡社会分割有所淡化，但在青年群体中出现了一种新型的城乡分割，这种分割导致青年人口的社会经济分化，而且原来存在于城市与乡村之间的城乡分割，被移入城市社会之中，在生活于城市的人们中建立起新的社会壁垒。这表明，城乡的不平等没有随着户口制度的弱化而消除，相反，存在于老一代人中的城乡不平等传递到了青年一代身上，而且通过这种代际传递，城乡不平等固化为阶级的不平等。

关键词 青年群体 户口制度 城乡分割 阶层分化

城乡居民之间的社会经济差异是当今中国社会最突出的不平等现象，导致这种现象的其中一个原因是长期存在的户

口制度，这一制度导致了城市社会和农村社会的分割，城乡社会分割使得城市人和农村人之间存在持续的、巨大的社会经济差异ⁱ。户口制度在 1950 年代开始实施，每个人都有一个人户口身份。户口制度区分出两种户口身份的人：农业户口和非农户口（也称之为城镇户口）。城镇户口的人可以享有更多的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同时，户口身份也与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的享有以及就业、住房、购房等机会相关。这种制度安排导致了城市人与农村人的社会分割ⁱⁱ。

1970 年代末期经济改革开始以来，户口制度逐步放松ⁱⁱⁱ，劳动力可以在城乡之间自由流动，农村人可以进城就业，在城市中出现了大量的农民工，2016 年农民工数量达到 2.74 亿^{iv}。与此同时，城市的就业机会、教育机会和福利保障等逐步向农民工开放。另一方面，最近十年，城镇化快速推进，大量农村户口转变为城镇户口，部分长期在城市就业和居住的农民工也获得了城镇户口。尤其最近三年政府推进户口制度改革，在一些中小城市城乡户口区分变得不再像过去那么重要，不过，大城市户口与其他户口的差异仍然十分重要，外来人口想要获得大城市本地城镇户口十分困难^v。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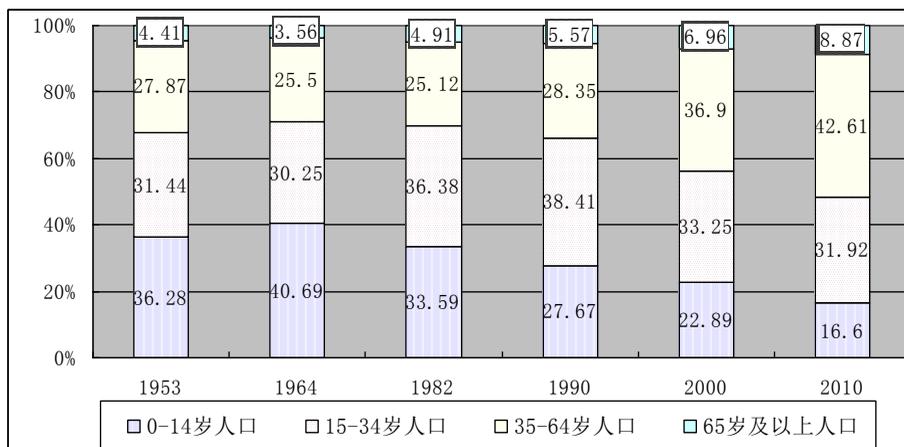
户口制度放松和城镇化推进，使得原来的城乡社会分割有所淡化，城乡之间的地理边界变得交错模糊。城乡分割界限的淡化对青年人产生什么影响？出身农村家庭的孩子是否可以享有与城市家庭出身孩子一样的发展机会？在青年一代中城乡分割界限是否还存在？本文基于调查数据显示，虽然从全社会范围来看，城乡社会分割界限有所淡化，但在青年群体中出现了一种新型的城乡分割，这种分割导致青年人口的社会经济分化。原来存在于城市与乡村之间的城乡分割，被移入城市社会之中，在生活于城市的人们中建立起新的社会壁垒。当今约 70% 的青年人生活于城市，而这些青年人被新型城乡壁垒区分为两大群体：大学生及毕业生与新生代农民工。这两个群体虽然都生活在城市之中，但生活境遇、行为方式、价值诉求差异鲜明，来自农村的青年人的上升社会

流动仍然存在多重障碍。

一、青年人口中的两大群体

根据 2000 年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 青年人口总数约为 4.03 亿, 约占总人口的三分之一。其中, 80 后人口总数约为 2.28 亿, 占总人口比例为 17%; 90 后人口总数约为 1.75 亿, 占总人口的 13%^{vi}。由于计划生育政策的作用, 90 后人口数量大大少于 80 后人数。图 1 列出历次中国人口普查数据中不同年龄组人群的比例, 自 1990 年代以来, 15-34 岁青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大幅下降, 从 1990 年的 38.41% 下降到 2010 年的 31.92%, 这主要是由于计划生育政策的影响。

图 1 青年人口与其他年龄别人口所占比重的历史变化



数据来源: 国家统计局历次人口普查数据 <http://www.stats.gov.cn>

计划生育政策不仅导致青年人口数量下降, 它同时还导致了青年人口中来自农村家庭的青年人比重上升。1980 年代初期政府开始实施计划生育政策, 然而, 计划生育政策实施的严格程度在城市与农村地区是不同的, 多数城市家庭只生

育 1 个孩子, 但多数农村家庭有 2-3 个孩子。表 1 比较了 80 后和 90 后独生子女比例的城乡差异。农村家庭出身的 80 后只有大约十分之一是独生子女, 农村家庭出身的 90 后独生子女比例也很低。而城镇家庭出身的 80 后和 90 后的独生子女比例则远高于来自农村的青年, 接近四分之三的城镇家庭出身 90 后和大约半数的城镇家庭出身的 80 后都是独生子女。总体而言, 独生子女现象主要存在于城市, 在农村只能说是少子化现象。由于 80 后和 90 后的父母一代绝大多数是农村人, 他们生育的子女数量又多于城市人, 所以绝大多数的 80 后和 90 后青年出身于农村家庭, 76.9% 的 80 后和 69% 的 90 后来自农村家庭, 而且多数 80 后和 90 后不是独身子女, 只有 27.5% 的青年人口是独身子女。

表 1 青年人口的独身子女比例 (%)

	出身农村家庭	出身城镇家庭	合计
80 后	10.9	51.5	19.7
90 后	27.0	72.2	35.7
Total	18.9	61.0	27.5

数据来源: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 2013 年中国社会状况调查

青年人口中出身农村家庭青年比重上升, 也导致青年人口中持有农业户口青年的比重上升, 这是因为子女的户口身份是由其父母的户口身份所决定。青年一代中出身农村家庭的比例以及持有农业户口的比例甚至高于他们的父辈的比例。这种现象使一些学者声称, 计划生育政策导致了“人口逆淘汰”, 农村家庭、贫困家庭、低文化水平家庭生育更多的孩子, 使得青年人口总体素质下降。同时, 这也进一步强化了青年一代的城乡差异, 经济条件较好并且文化水平较高的城

市父母集中整个家庭的经济社会资源培养他们唯一的孩子,而较为贫困、低文化水平的农村父母只能把他们有限的资源分摊到多个子女身上。这实际上导致了城市孩子与农村孩子的成长经历和社会化过程的两极分化,当城市孩子被大众媒体称之为“被宠坏的小皇帝”时,大多数的农村孩子不得不过早辍学分担父母的经济负担。这种两极分化现象在 80 后身上表现得最为明显,本书第 2 章所讨论的“80 后现象”主要是指城市家庭出身的 80 后青少年。1990 年代和 21 世纪初出现在公共视野中的 80 后们都是都市青少年,直到 2008 年北京奥运会期间,受到主流媒体大加颂扬的 80 后仍然主要是指受过良好教育的都市青少年,而到这个时候,人们开始注意到还有数量更为庞大的、与大众媒体宣扬的 80 后完全不同的 80 后群体,他们似乎是 80 后中的那个“沉默的大多数”。这个“沉默的大多数”是来自乡村的青年人,他们在 80 后中占有四分之三的比例,在 90 后中占三分之二。90 后青少年成长时期,农村的经济收入和生活条件得到较大改善,农村家庭出身的 90 后与城市孩子的生活环境差距相对于 80 后来说有所缩小,但城乡差异在 90 后身上仍然表现突出。当大多数城市家庭出身的 90 后都在高中毕业后进入大学学习时,大约半数的农村家庭出身的 90 后们在初中毕业后就离开学校,进入劳动力市场打工谋生。

虽然超过 70%的青年人来自农村家庭,但现今他们大多数生活在中国城市。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 2013 年中国社会状况调查数据,超过三分之二的青年人就业和居住在中国城市,仅有 31.3%的青年人居住在农村,但他们大多数生活于工业化或半工业化的农村地区,也就是说,他们是在工厂工作,而不是从事农业生产。2013 年的调查数据显示,仅有 8.4% 的青年人从事农业生产,居住于真正的农村地区。这意味着这些农村家庭出身的青年人现今多数已经不再是真正的农村青年,而是由农村移居城市,进城打工的人。进城打工的人被称之为农民工,80 后和 90 后农民工因其行为方式和

价值诉求与老一代农民工有所不同，被称之为新生代农民工。

新生代农民工成为当代青年人口中数量最为庞大的一个群体，而与之相对应的、差异十分明显的另一个群体是大学生和大学毕业生。大学生和大学毕业生群体的多数成员来自城市家庭，当然也有相当数量的大学生和大学毕业生来自农村家庭，通过上大学，他们可以把农业户口身份改变为城市户口，成为新一代的城市人。在青年人口中，大学生和大学毕业生数量远远少于新生代农民工的数量，但是这个群体数量增长很快。1990年代末期，中国青年人只有十分之一能上大学，1999年政府开始实施大学扩招政策，随后大学招生人数迅猛增长，大约20%的80后青年人接受了大学教育，而达到上大学年龄的90后接近40%能进入大学学习。据教育部发布的《2015年全国教育事业统计公报》，我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了40%，比十年前增长了20多个百分点，在校学生人数达到3647万人^{vii}。从而，在当今青年一代中，新生代农民工和大学生及大学毕业生构成了两个主要的、差异鲜明的社会群体。根据2013年中国社会状况调查数据，在整个青年人口中，大约30%是大学生和大学毕业生，大约45%是新生代农民工，另外的25%是一些人数较少、处于边缘状态的小群体。其中约10%是生活在农村的真正意义上的农村青年，他们零星分布于广大的农村地区，很难让人们发现这个群体的存在。还有约百分之十几的青年人是出身于城市家庭而没有上大学的青年人，他们中的一部分人依仗城市父母的社会关系和经济资助，可以获得与大学毕业生类似的工作和生活条件，而另一部分人的生存状态与新生代农民工类似。总之，人们印象中的中国青年一代，有两种差异鲜明的形象：以都市青年为主的、受过良好教育的青年人；和来自农村的、在工厂、工地和各类服务行业打工的青年人。当我们讨论当代中国青年的特征时，首先要搞清楚我们说的是哪个青年群体。

二、青年群体中的新型城乡分割

随着大量农村青年涌入城市而成为城市里的农民工，城市人与农村人的鲜明差异被带入城市之中，大学生和大学毕业生与新生代农民工的差异同样显而易见。现今居住在城市青年人中，42.4%是大学生和大学毕业生，44%是新生代农民工，另外14%是处于两大群体之间的人群。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一半的城市里的青年人是大学生和大学毕业生，另一半是新生代农民工。虽然都生活在城市，但他们的社会经济状况以及社会态度行为十分不同。

表 2 城市中两个青年群体的社会经济状况比较 (%)

	大学生和大学毕业生	新生代农民工
农业户口	30.6	88.2
居住在城市边缘地区	10.8	53.4
非正规就业	12.5	49.6
随时可能失业	10.7	23.7
没有养老保险	26.5	59.6
没有失业保险	44.8	89.4
没有工伤保险	42.8	82.9
没有生育保险	50.9	89.4
基本不阅读书报	9.2	43.1
不用微博	27.1	50
不用 email	10.1	49.7

数据来源：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 2013 年中国社会状况调查

表 2 列出两个青年群体的生活状态差异。88.2%的新生代农民工持有农业户口，只有略超过十分之一的新生代农民工持有城镇户口。作为户口制度改革的一个部分，一些地方城市政府为了留住某些稀缺技术人才，允许少量的、长期在本市工作（通常十多年甚至二十多年）并拥有特殊技能的新生代农民工改变户口身份，获得本地城市户口。在一些中、

小城市，当地政府为了促进本地住房销售，给予在本地购房的人本地城镇户口，一些农民工通过这种方式改变了户口身份。大学生和大学毕业生群体持有农业户口的比例远低于新生代农民工，只有 33.6% 的大学生和大学毕业生是农业户口。按照国家政策的规定，考上大学的人都可以获得城镇户口，长期以来，上大学是农村人改变户口身份的最主要的途径。不过，近年来出现的一些民办大学，不能给学生办理户口变更，使其学生继续保留原有的农业户口。而且这类大学由于教学质量差，其文凭在劳动力市场中缺乏竞争力，毕业生只能在中、小型私营企业或非正规就业领域中找到工作，而这类雇佣企业也不可能帮助毕业生改变户口身份。在持有农业户口的大学生和大学毕业生中，也有一些人可以把户口转变为城镇户口但自愿保留农业户口，这类人大多来自大城市郊区农村。由于房地产开发，大城市周边农村土地价格上涨，当地农村居民常常获得极高的拆迁补偿或其他经济收益，拥有这里的农业户口的人是不愿意改变他们的户口的。

近十几年中国房地产价格高涨，低收入人群被挤出城市中心地带，迁往城市远郊，在许多大城市的周边地区形成了大量的流动人口集聚的居住社区。这类社区环境脏、乱、差，房屋大多是农舍或老旧低层楼房。53.4% 的新生代农民工居住于这类地区，而大学生和大学毕业生居住于这类地区的比例仅为 10.8%。居住在城市中心地区的新生代农民工的居住环境通常也不好。在广州，城市市区中保留了一些拥挤脏乱的“城中村”，许多农民工居住于此。在北京，城市中心地区较少保留有贫民社区，许多农民工是居住于高层建筑的地下室。

在就业方面，大约半数的新生代农民工是非正规就业，大学毕业生非正规就业的比例只有 12.5%。新生代农民工的失业风险也明显高于大学毕业生。不过，总体而言，新生代农民工就业机会还是比较多的。许多制造业工厂因不能招到足够的青年农民工而面临“招工难”问题，城市里发展迅速

的低端服务业也给青年农民工提供了大量的就业机会。

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保障水平低于大学毕业生。约十分之六的新生代农民工没有养老保险，接近十分之九没有失业保险和生育保险，超过十分之八没有工伤保险。这意味着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的生活和就业是缺乏保障的。由于新生代农民工多数就业于非正规部门、私营中小企业和低端服务业或自雇经营，这些领域的就业常常不能提供社会保障，大学毕业生的社会保障也没有普及，但他们享有社会保障的比例明显高于新生代农民工。

近年来智能手机的普及使城乡青年的数字鸿沟有所缩小，大多数新生代农民工可以通过手机上网。但是尽管如此，大学毕业生与新生代农民工在文化生活和信息交流方面的差异仍然十分突出。大约半数的新生代农民工不用 email，不用微博，也基本上不阅读书籍报刊。

随着 80 后青年逐渐步入成家立业的年纪，大学毕业生与新生代农民工之间的差异已经固化为阶级的分化，这两个社会经济差异鲜明的群体正在成为城市社会中的两个主要社会阶级的核心成员：即未来的中产阶级与新工人阶级，他们的社会特征和利益诉求各有不同。大学毕业生们大多从事白领职业，是未来的中产阶层成员。他们常常是互联网上的活跃分子，引领大众媒体和流行文化的潮流。新生代农民工是新工人阶级的主要构成部分，他们成为近年来频繁爆发的劳工运动的发起者和主要参与者。

当今的中国领导人提出了“中国梦”的口号，承诺帮助人们实现他们的梦想。对于大学生和毕业生来说，他们的一个重要梦想是早日过上中产阶级的生活：能有一份收入稳定、受人尊敬的工作；买得起房子和汽车；负担得起中产阶级的生活方式（比如丰富的休闲娱乐生活、能出国旅游、子女能享有优质的教育等等）。他们还希望能有自由宽松的社会氛围，能够自由表达他们的个性理念，参与公共事务决策。新生代农民工的一个主要的梦想是能像城市人一样在城市里生

活：能在城市里有份工作，维持他们在城市里的生活；获得城市市民身份，受到当地人的尊重（如所谓的“新上海人”“新北京人”等）；他们还希望打工挣钱后开创自己的小生意。然而，不论是大学毕业生还是新生代农民工，他们实现梦想的道路上存在许多障碍：激烈的就业竞争；高涨的房价；不断上升的生活成本；上升社会流动渠道狭窄（“拚爹”现象、“寒门难出贵子”）；这些障碍导致年轻人焦虑心态。互联网成为年轻人宣泄情绪、分享焦虑心态的平台。

三、“蚁族”青年：拥有大学文凭的底层人群

考上大学是许多农村子弟改变其命运的主要方式，是他们越过城乡分割门槛的重要途径。1999年大学扩招政策实施以后，高等教育机会大幅增长，农村子弟上大学的机会也在增长。然而，大学生数量增长，同时也导致大学文凭在劳动力市场的含金量下降。大学扩招之前，农村子弟只要考上大学就能改变户口身份，有了大学文凭就能保证他们获得稳定的白领职业，从而成为真正的城市人。但现今，有了大学文凭的农村子弟能否真正摆脱农村人身份，成为城市中产阶级的一员变得不那么确定了。

表 2 数据显示有大约十分之一的大学毕业生居住于城市边缘地区，处于非正规就业状态，随时有失业风险，基本没有社会保障，这部分大学毕业生的就业和生活状态与新生代农民工类似。这是一个农民工化的大学毕业生群体，媒体把他们称之为“蚁族”。2007年北京大学的博士生廉思在北京郊区的一个叫唐家岭的居住社区里最早发现了这个特殊的群体。他这样描述这个群体的状态：“该群体高知、弱小、聚居，是继三大弱势群体（农民、农民工、下岗职工）之后的第四大群体，他们受过高等教育，主要从事保险推销、电子器材销售、广告营销、餐饮服务等临时性工作，有的甚至处于失业半失业状态；他们平均月收入低于两千元，绝大多数没有‘三险’和劳动合同；他们平均年龄集中在 22-29 岁之

间,九成属于 80 后一代,他们主要聚居于城乡结合部或近郊农村,形成独特的‘聚居村’。他们是有如蚂蚁般的‘弱小强者’,他们是鲜为人知的庞大群体。”^{viii} 廉思把这个群体称之为“大学毕业生低收入聚居群体”,这个群体低收入、缺乏就业稳定性、生活和居住条件恶劣、工作环境农民工化。同时他还发现这个群体容易对社会产生不满情绪,经常在网络上发表极端言论。根据廉思对北京“蚁族”的调查,这些青年人对政府的信任度普遍不高,对政府处理社会群体事件及其不满,对于政府的“社会保障”政策、“反腐倡廉”政策、“调控房价”政策也表现出不信任。^{ix}

这一群体的大多数成员来自农村,还有少部分来自小县城和小镇。而且,他们中的大部分毕业于二、三流大学。中国高等教育体系有两种大学文凭区分,一种是 4-5 年制的本科文凭(本科大学),另一种是 3 年制的大专文凭(高等职业学校)。本科文凭在劳动力市场上被认为是正规的大学文凭,而大专文凭经常被认为是不太正规的大学文凭。同时,本科大学又可分类为重点本科大学和普通本科大学。重点本科大学大多是教育部直属高校,并且受到国家的特别巨大的经费支持(所谓“985 工程”或“211 工程”),其中的 48 所“985 高校”是全国最好的大学,113 所“211 高校”也基本上是全国大学排名前 100 名的学校。“985 高校”和“211 高校”的文凭在劳动力市场上比普通本科大学文凭更有竞争力,许多大公司、政府机构和大学的招聘广告都注明“应聘者必须是 985 或 211 高校毕业生”。大学文凭的等级分类决定了不同类型学校的毕业生在劳动力市场中的不同境遇,高职院校毕业生和部分普通本科大学毕业生不得不接受低收入、缺乏社会保障和就业不稳定性工作。在房租和其他生活成本不断上升的大城市,这些毕业生落入生活窘迫境遇。城市家庭出生的毕业生往往能够获得父母的经济资助,帮助他们度过困难时期。但是,大多数农村家庭出生的毕业生不能得到父母的帮助,从而容易落入“蚁族”群体。按廉思的说法,

“蚁族”是典型的“穷二代”和“农二代”。^x

表 3 不同等级学校学生城乡来源比较 (%)

学生来源	精英本科大学	北京重点本科大学	重点本科大学	普通本科大学	高职院校
城市	65.2	63.4	54.7	43.8	20.1
农村	34.8	36.6	45.3	56.2	79.9
合计	100	100	100	100	100

数据来源：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2015 年度中国大学生及毕业生就业、生活和价值观追踪调查”

高职院校毕业生最可能成为“蚁族”，而绝大多数高职院校的学生来自农村家庭。表 3 数据列出不同等级学校学生城乡来源比例，显示出本科大学与高职院校的大学生来源存在着明显的城乡差异。大约 80% 的高职院校学生出生农村家庭，多数的普通本科大学学生来自农村家庭，而多数的重点本科大学学生来自城市家庭。北京集中了最多的重点大学（9 所 985 大学和 25 所 211 大学），而北京的重点大学学生来自城市家庭的比例更高。精英本科大学（即全国大学排名前 10 的名校）的学生大约三分之二来自城市家庭。农村家庭子弟由于家庭资源匮乏和农村学校教育质量较差，在激烈的高考竞争中处于劣势地位，即使能考上大学，大多只能进入高职院校或二、三流的本科大学，而这批人成为“蚁族”的主要来源。

结论

快速的社会经济变迁给中国社会带来了突出的代际差异现象，80 后现象和 90 后现象使人们的关注点集中于青年一代与老一代人的差异，并且常常强调青年一代的共性而忽视青年一代内部的差异。然而，青年群体内部的差异也许并不比代际差异小。青年群体中存在着鲜明的社会分化，户口制

度和教育分层是导致分化的重要机制，这两种机制有着叠加效应。那些来自农村家庭又未能获得高等教育的农民工构成了青年一代中的社会下层，未来他们会像他们的父母一样落入社会的下层。那些拥有较好社会经济背景的城市家庭子女绝大多数接受了高等教育，他们成为青年一代中的中上层，未来他们将加入中产阶级，其中的一部分还会成为社会精英。这表明，城乡的不平等没有随着户口制度的弱化而消除，相反，存在于老一代人中的城乡不平等传递到了青年一代身上，而且通过这种代际传递，城乡不平等固化为阶级的不平等。当今的青年一代是打上代际与阶级双重烙印的一代。从代际文化的表相来说，这代人的共性很明显，但这些共性无法弥合农民工和受过高等教育的白领之间的差异，因此，代际差异的共性未能打破社会不平等的再生产模式，跨阶级代际文化无法突破社会生活领域中的阶级分割，当然，也未能突破长期存在的城乡分割。

青年一代的城乡分割在城市，尤其大城市，表现得更为突出。随着农民工进城，原有的城乡分割进入城市内部，在新生代农民工与大学生及毕业生之间竖起了一道社会经济壁垒，导致青年一代分化为社会经济地位差异鲜明的两大群体。进入城市的新生代农民工是怀揣梦想而来，他们不满足于“打工挣钱、回乡盖房娶老婆”（老一代农民工的梦想），他们期望能在城市里过上体面的生活，拥有体面的工作，获得个人发展的机会。然而，户口身份的制约和缺乏学历文凭阻碍了他们上升社会流动的渠道，同时还使他们获得市民身份障碍重重，这种境遇状况使他们感受到较强烈的相对剥夺感和不公平感。现今，具有较强烈的相对剥夺感和不公平感并且善于表达利益诉求的新生代农民工成为中国工人阶级的主要构成部分，一些学者把他们称之为新工人阶级，之所以说他们是“新”工人阶级，是因为他们在价值态度和行为取向方面与传统的“老”工人阶级极为不同，主导他们行为的不仅是经济理性而且也有价值理性，他们的诉求超越了一般

的经济需求，而展现出一些自我价值追求。在他们身上已经有阶级意识和阶级行动的迹象，而这将会导致劳资冲突越来越频繁和越来越严重。

受过高等教育的青年一代（大学生和大学毕业生）是新中产阶级的后备力量，但目前他们成为新中产阶级的道路上遇到很大障碍，他们对国家理念和国家的成就和未来持有认同，但对自己的现状并不满意。巨大的就业压力和购房压力，导致这一群人存在着集体焦虑——未能达到中产阶级状态的焦虑心态。理想与现实的剧烈冲突在这群人身上表现非常突出。受过高等教育的青年，尤其是毕业于名牌大学并就业于大城市的青年，有机会接触较多西方社会文化信息，易于受到西方意识形态的影响，对西方政治制度有或多或少的认同。他们的社会参与意识较高，对政府社会治理水平和公共服务质量有较高要求。

新型城乡分割不仅导致了两类青年群体的生活境遇的分化，更为重要的是，它还引发了文化价值的冲突。最近两年，在大众媒体，尤其是互联网和社交媒体上，不断出现带有相当情绪化的观点争论。互相攻击的双方带有明显的阶层分化的印记，一方是来自大中城市、生活境遇较好、拥有较高文化水平的青年人，另一方则是来自农村或小城镇、文化水平较低、生活境遇较差的青年。大城市的青年精英们把那些在网络上发表极端言论的中下层青年人称之为“五毛党”、民粹主义者、极端民族主义者和反智主义者，而数量庞大的中下阶层青年或小城镇和农村青年则攻击那些青年精英们是“汉奸”、“卖国贼”、被西方国家收买的“走狗”或腐败分子。这些互联网上的争论，显示出了精英和中产阶层上层与中产阶层下层和工农群体之间的文化价值的分化，这种分化在青年群体中表现的最为突出。一些政治学研究者对此现象总结为“越富越民主、越穷越爱国”^{xi}。如何满足不同青年群体的需求，消除两个群体之间的社会隔离，缩小两个群体之间的社会经济不平等，消弥文化价值冲突，帮助青年人

实现梦想,是政府政策制度者需要认真考虑的问题

¹ 李培林等,1995,《中国新时期阶级阶层报告》,辽宁人民出版社,第64-67页;李实、罗楚亮等,2014,《中国收入差距的实证分析》,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第26-31页;李培林、李强、马戎主编,2008,《社会学与中国社会》,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第573-577页。

¹ 李丽梅、陈映芳、李思名,2015,“中国城市户口和居住证制度下的公民身份等级分层”,《南京社会科学》第2期第52-60页。

¹ 张玮,2011,“中国户籍制度改革地方实践的时空演进模式及其启示”,《人口研究》第5期第71-80页。

¹ 国家统计局,2016,《2016年全国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国家统计局网站 <http://www.stats.gov.cn>

¹ 郭秀云,2010,“大城市户籍改革的困境及未来政策走向:以上海为例”,《人口与发展》2010年第6期;郭秀云,2016,“户籍制度功能异化与渐进回归——兼论“后户籍时代”政策议题”,《社会科学》第2期第64-76页。

¹ 李春玲、施芸卿主编,2013,《境遇、态度与社会转型:80后青年的社会学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第35页。

¹ 教育部,2015,《2015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教育部网站 <http://www.moe.gov.cn/>

¹ 廉思主编,2009,《蚁族:大学毕业生聚居村实录》,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封面夹页。

¹ 廉思主编,2013,《2013年青年蓝皮书:中国青年发展报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第28页。

¹ 廉思主编,2013,《2013年青年蓝皮书:中国青年发展报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第30页。

¹ Jennifer Pan and Yiqing Xu, 2015, China's Ideological Spectrum, MIT Political Science Department Research Paper No. 2015-6.

5. 不平等引发的青年激进政治态度及行为

The Radical Political Attitude & Behavior of the
Youth Caused by Inequality

马锋, 伊万·精液师
Ma Feng, Ivan Semenist

摘要：08年经济危机后，主要发达国家和地区陷入债务和金融危机，对社会层面产生深层次的冲击，经济的停滞、紧缩政策实施、社会福利的删减，让处于社会底层的百姓，特别是刚刚踏入社会的青年人面临失业和就业困难，严重影响到青年人的生存，相对剥夺感的存在和社会发展的不平等，使得他们对现存社会的组织和运作方式怀有强烈的不满，对现存社会制度抱有彻底的否定态度，急切地希望对社会进行根本性急剧改变。享受了二战后长期和平和高福利为代表的物质富裕后，青年人在经济危机冲击下，重新回归物质匮乏，成为酿成主要发达国家和地区青年人激进政治态度和行为生成的主因，也使主要发达国家进入后物质主义匮乏引发的社

会结构及价值观“再重构”阶段。

关键词:物质主义匮乏; 后物质主义匮乏; 社会化; 激进政治态度; 生成机制

一、后物质主义匮乏背景下青年人激进政治态度和行为成因及演化

后物质主义匮乏是在后物质主义背景下, 08 年经济危机发生过后引发的, 使得主要发达国家和地区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 也是导致主要发达国家和地区社会价值观向极端民粹、右翼为代表的激进政治态度和行为转变的主因。物质主义匮乏、后物质主义富裕、后物质主义匮乏从时间点上可以划分为二战前(1945 年)、二战后到 08 年经济危机(1945-2008)和 08 年经济危机至今(2008 年-), 其各自的特点也有不同, 如上文所分析, 可见表一。

表一: 从物质主义到后物质主义匮乏阶段价值观社会发展变化

时间	二战前 (1945 前)	二战后 (1945-2008) 到 08 年经济危机	08 年经 济危机后 (2008 年-)
发展阶段	物质主义阶段 (匮乏阶段)	后物质主义阶段 (富裕阶段)	后物质主义阶段 (匮乏阶段)
价值观	物质主义价值观	后物质主义价值观	后物质主义匮乏价值观
价值观维度	生存价值观	幸福或自我实现价值观	生存价值观
特点	关注生存和人生安全, 对生	关注尊重、归属和自我实现的需求, 属于高阶需	生存、对未来的恐惧、相对剥

	存、安全等低阶需求关注较多，二战前出生人群。	求，是在满足低阶需求后产生的。	夺感的存在、社会不公和不平等。生存需求强烈，归属和自我实现的需求存在，突出特点是基于自我实现高阶需求的生存需求。
政治态度及行为	社会对立冲突严重，抗争多采用暴力形式。	更加注重对环境的保护、对多元文化的宽容，对经济和政治生活的经济参与，在宗教、同性恋、女权、种族等社会问题表现的更加包容	对同性恋、宗教、移民宽容、包容的价值观正在发生改变，一些以发表反移民、反宗教等极端言论的政治人物获得大量支持，激进政治态度和行为的社会氛围成型

后物质主义匮乏背景下对生存和安全的关注成为价值观的重要优选，青年人的群体和社会底层相对匮乏的出现，让对同性恋、移民、难民、宗教等宽容的价值观让渡给了激进

的态度和行为，并成为社会的一股力量。英国脱欧实力的强大和掀起的争论实际上和美国的特朗普现象没有什么本质的区别，是对未来的恐惧和全球化、区域化稀释自己“利益”的必然反应，走向自私的利益保护而不是包容的开放共享就成为危机冲击背景下基于生存的一种选择。

实际上，本轮经济危机从发生到深层次影响的今天，8年的时间从已经发生的事实来看，对世界主要国家和地区形成了大致三轮的冲击波，而且在社会层面引起的变化是螺旋上升式的，最直接的反馈指标就是主要国家和地区激进政治态度和行为的升级。这一轮冲击正从体制外向体制内迅速传导，并且在主要国家和地区社会内部获得大量的支持，存在“强烈的仇外情绪以及超越于选举之外的街头运动倾向。”⁴（见表二）。

表二： 08年经济危机以来激进政治态度和行为冲击及成因

	第一轮冲击波	第二轮冲击波	第三轮冲击波
时间	2008年到2012年左右	2012年年中到2015年	2015年年底-
主要发达国家和地区	“占领华尔街运动”和希腊的抗通缩游行	2012年伦敦奥运会之前的骚乱、法国总统萨科奇下台。香港和台湾出	特朗普即将成为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台湾极端“台独”势力，时代力量进入“立法机构”，德国极右政党选择

⁴ Jonathan Birdwell, Jamie Bartlett, “Populism in Europe: CasaPound.” 资料来源：
http://www.demos.co.uk/files/477a_Populism_Italy_web.pdf?1349355822.

		现学运。	党在地方选举强劲表现，并进入议会严重冲击既有政党格局
主要 发展 中国 家和 地区	“阿拉伯之 春”	叙利亚内战开始，乌克兰广场革命集中爆发。	巴西总统罗塞夫遭弹劾停职。
特点 及原 因	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由于社会机制较差，抗危机能力不强，直接引发暴力激进行为。主要发达国家和地区尚能维持采用体制内示威、游行的平和方式。	在老牌的、社会民主机制健全的资本主义国家发生严重暴力激进行为，预示着新一轮冲击的到来，并开始突破既有的社会秩序和组织体系。济危机的冲击效应进一步扩大，激进政治态度和行为进一步扩展	代表的民粹、极端激进政治态度和行为，赢得社会大量的支持率，且长久维持高位，而且极端激进政治态度和行为的参与者，在第二轮冲击中秩序的破坏者，通过既有的社会体系，进入政权内部进行运作。正在延续和演化的第三轮冲击，向着激进政治态度和行为“合法化”的方向发展。

实际上，这三轮冲击的表现，其主导和参与的主要力量是青年人，“民粹主义政党一个特点就是支持者的年轻化。”

⁵在第一轮冲击来临的时候,发达国家和地区的青年人,还是采用和平手段的,但是在欠发达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物质长期处于匮乏阶段,两极分化严重,处于社会底层的人,在经济平静时尚能忍受,但是经济一受到波动,矛盾即刻显现,迅速发展为暴力推动的政权更迭事件。在发达国家和地区,面对经济危机对生存的威胁和相对剥夺感的出现,青年人采用“合法”行为表示诉求,主要是发达国家和地区相对抵抗力强,社会保障机制比较健全。但是随着危机的深入,逐步进入后物质主义匮乏阶段,青年人受到的影响进一步加大,发达国家和地区特别是欧盟陷入主权债务危机,进入紧缩财政阶段,社会福利开支大幅减少,青年人进一步受到打击,且就业不振,其诉求迟迟得不到解决,则在发达国家和地区衍生出采用暴力手段对抗既有社会体系和秩序的行,也就成为一种必然。

二、后物质主义匮乏下主要发达国家和地区青年人激进政治态度和行为生成机制

战后相当长的时间里,人们经历了物质极大富裕的时代,这在主要发达国家和地区是明显的,而且经济的繁荣让人们摆脱了对生存的忧虑,在物质极大丰富的背景下,人们可以专注于对幸福和自我实现的需求。但是,我们需要指出的是“不同国家人们的幸福感可能受到文化的强烈影响”,除此以外,“人们的幸福感在经济增长的初期也出现增长,然后出现淡化。”⁶进入上世纪80年代资本主义“滞胀”发展阶段以后,经济发展的相对停滞在主要发达国家和地区就已经在“淡化”经济增长对幸福感提升的影响。进入90年代后,互联网新经济的发展,推动主要发达国家和地区进入新繁荣期,将已经显露出来的后物质主义匮乏推迟了,使得激进政

⁵ Reinhard Heinisch, “Success in Opposition-Failure in Government: Explaining the Performance of Right-wing populist parties in public office.” *West European Politics*, Vol.26, No.3, 2003, p.91-130.

⁶ [美]理查德·威尔金森, 凯特·皮克特:《不平等的痛苦》, 安鹏译, 北京: 新华出版社, 2010年, 第8页。

治态度和行为局限在小范围内。然而，随着互联网新经济的功能的弱化，让传统的以阶级为基础的政治分裂失去了原有的重要性，超越阶级的议题变得更加重要，如基本生活条件问题。⁷战后 50 年代、60 年、70 年代经济繁荣、物质富裕背景下，长期左右轮流加码社会福利的执政方式随着经济增长的停滞和弱化，财政破产难以为继，生活条件迟迟无法改善，选民对传统左右政党政治的格局产生了厌倦，近 20 年来，整个欧洲各国选举的投票率呈下降趋势，选民弃权的现象越来越明显⁸。希望出现新的政党或者超越原来左右格局的政党出现成为选民的期待，实质上也是对改变生活条件的期待，民粹主义政党的出现及中间化，以及跨界的特征吸引了大量的人群，在失业率高和生存条件窘迫的青年人那里最为明显⁹。以美国经济增长和基尼系数变化情况为例（表三\表四\图一\图二）¹⁰，可以明显的感受到，在经济快速增长的基尼系数相对是稳定的，但是自上世纪 90 年代起随着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增速的降低，基尼系数实际上较 70 年代中期有所扩大。

表三：二战后美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增速

时期	美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增速 (%)
1950-1959	2.3
1960-1969	3.0

⁷ John T.Ishiyama,“The Communist Successor Parties and Party Organizational Development in Post-Communist Politics.”Political Research Quarterly,Vol.52,No.1,1999,p.89.

⁸ Pascal Delwit, “the End of Votersn in Europe? Electoral Turnout in Europe since WWII.”Ope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Vol.3,No.1.,2013,p.44-52.

⁹ Arnauld Miguët, “Election Report- The French Election of 2002:After the Earthquake, the Deluge.”West European Politics,Vol.25,Issue 4,2002,p.207-22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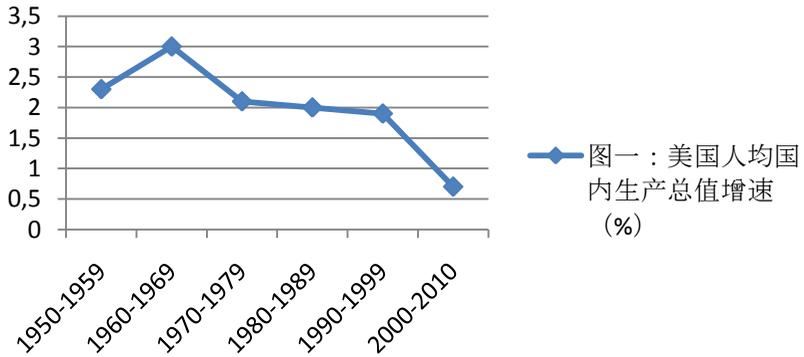
¹⁰ 注：根据安格斯·迪顿(Angus Deaton)所著，逃离不平等，中信出版社 2014 年版，第 145 页资料和世界银行 (<http://www.worldbank.org>) 数据编制，详细资料请参阅此出处。

1970-1979	2.1
1980-1989	2.0
1990-1999	1.9
2000-2010	0.7
根据世界银行数据, 08年为-1.2, 09年为-3.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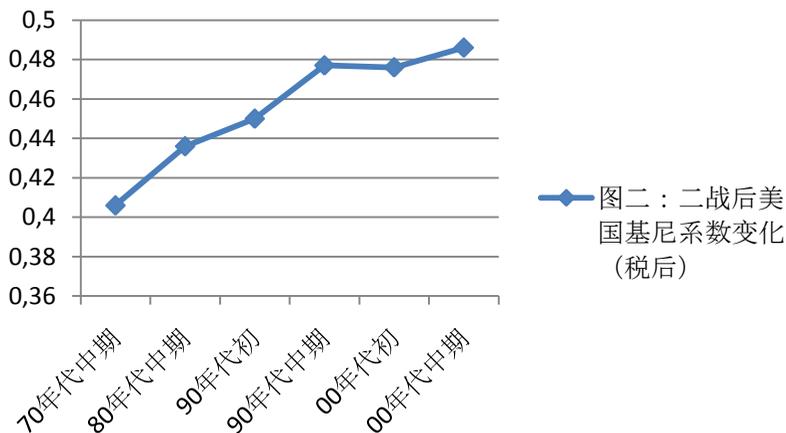
表四: 二战后美国基尼系数变化(税后)

时期	二战后美国基尼系数变化(税后)
70年代中期	0.406
80年代中期	0.436
90年代初	0.450
90年代中期	0.477
00年代初	0.476
00年代中期	0.486
00年后代期	0.486

图一：美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 增速 (%)



图二：二战后美国基尼系数变化（税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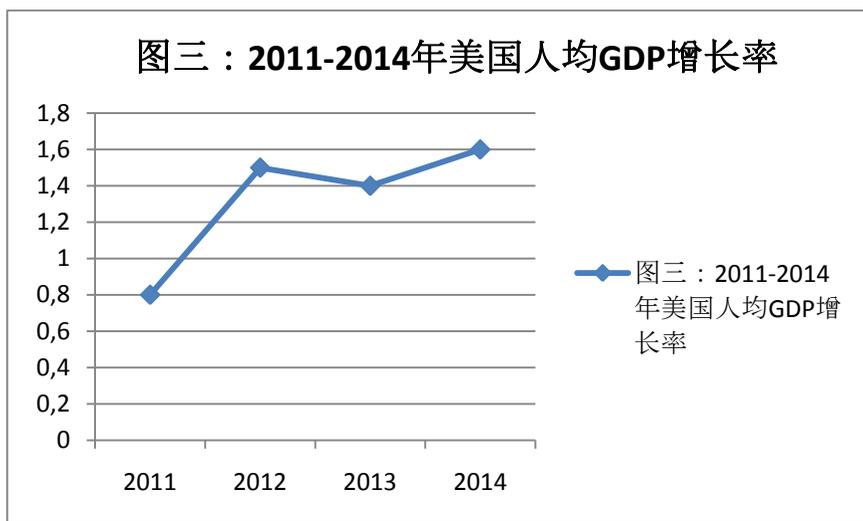


从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速从 3.0%降低到 1.6%（去掉 08 年、09 年数据，21 世纪初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速 1.6%）看起来差距不大，但如果从复合增长率来考虑，则意味着原本 25 年的时间可以实现人均收入翻倍，而现在则人均收入只增长了不到 50%¹¹。同样的，伴随着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速从 60 年代的 3.0%降低到 1.6%，基尼系数也从 70 年代的 0.406 扩大到了 21 世纪初的 0.486。这样的事实表明，在经济发展史上，一个国家迟早会跨入一个富足到收入增加对健康、幸福和满意度影响“日益减少”的阶段，一个发达国家的平均收入在过去 150 年中几乎一直在持续增加，但新增的财富并未带来同样的好处¹²。实际上，这样一个“日益

¹¹[美]安格斯·迪顿著：《逃离不平等》，崔刚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4 年，第 145 页。

¹²[美]理查德·威尔金森，凯特·皮克特：《不平等的痛苦》，安鹏译北京：

减少”而又“未带来同样好处”的阶段实际上就是后物质主义匮乏阶段，并由此引发一系列问题。自进入 2010 年代后，美国人均 GDP 较之 2010 年之前有了很大的增长（图三¹³），但是在经历了 08 年为-1.2%，09 年为-3.6%引发占领华尔街运动为第一波冲击后，即使收入增长在数据上看是稳定的、生活是改善的，但是现实生活中的“无感”，依然让经济增长了，但“未带来同样好处”成为引发后物质主义匮乏的另类注脚。



而其实质是现实生活中不平等和相对剥夺感的存在和对

新华出版社，2010年，第9页。

¹³ 注释：根据世界银行数据编制：参考网址：

http://search.worldbank.org/quickview?view_url=http%3A%2F%2Fdatatabanksearch.worldbank.org%2FDataSearch%2FLoadReport.aspx%3Fdb%3D2%26cntrycode%3DUSA%26sercode%3DNY.GDP.PCAP.KD.ZG%26yrcode%3D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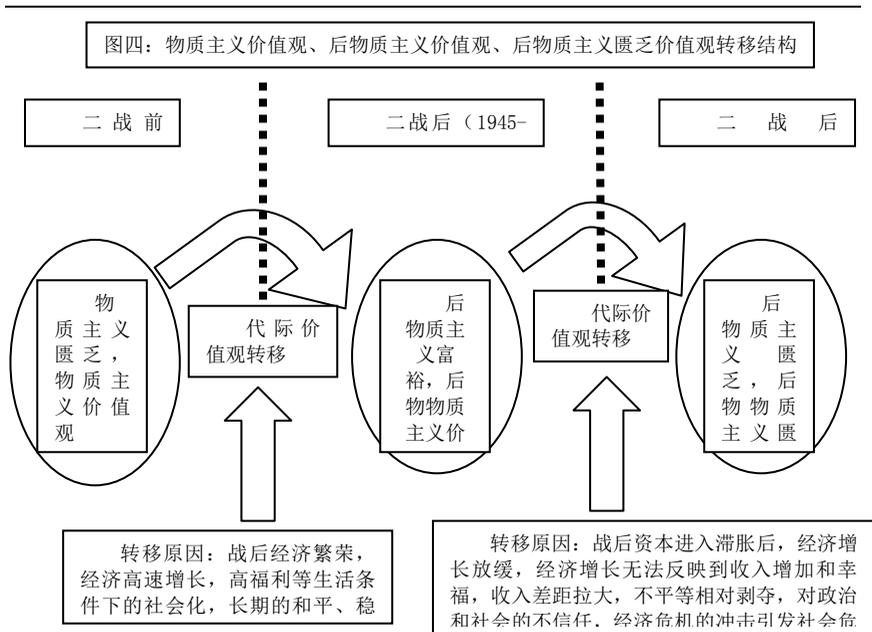
二战后后物质主义富裕阶段以来政治体系在后物质主义匮乏阶段无法实现改变的一种集体的不信任,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并呈现一种扩散性,08年经济危机后,从主要发达国家和地区到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一系列由青年人主导的激烈政治态度和行为的表现呈现出巨大的社会风险,而且这种现代风险的危害已远远逾越了现代工业所内含的民族国家的发展及其疆域边界的逻辑¹⁴,并引发一种系统性的对政府、社会不信任的危机,信任风险随着近些年以来人类面临越来越严重的共同的生存危机的出现而产生¹⁵,如上文所述,近20年欧洲投票率的下降,政治参与水平的降低,实际上将这种系统的信任降低到了低点,当公民感受到被允许较高等度的参与系统表现良好时,才会使公众提高对系统运行状况的满意度,对系统给予更大程度的支持¹⁶。然而,处于后物质主义匮乏阶段生存风险的存在,实际上对二战后形成的“政治正确”为基础的后物质主义价值观产生了怀疑,更对90年代以来经济全球化和区域一体化产生了怀疑,在欧洲民粹主义横行,民粹主义政党所代言的公众情绪就是反对精英统治,质疑欧洲一体化甚至全球化¹⁷,并利用经济衰退形势下人们的不安全感加强对政府的怀疑,在宣扬反对外来移民的同事,利用“伊斯兰恐惧症”,把伊斯兰移民作为主要攻击目标。对未来的恐惧和担忧,剥夺感、不平等的存在,信任的缺失和怀疑的存在,不安全感的产生,让人们又回到了类似物质主义匮乏阶段的状态,将生存和安全的需求重新排到了价值观的优先选项,实现了价值观的再转移(图四)。

¹⁴[德]乌尔里希·贝克:《全球风险世界:现在与未来.当代西方学术前沿研究报2005-2006》,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84页。

¹⁵马峰:《阶层变迁与信任风险规避》,载《北京电力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11(9上),第92页。

¹⁶[美]阿尔蒙德,加布里埃尔·A,西德尼·维巴:《公民文化——五个国家的政治态度和民主制度》,张明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

¹⁷Florian Hartleb,“After their Establishment: Right – wing Populist Parties in Europe, Brussels: Centre for European Studies.”2011,p.43.



后物质主义匮乏下对生存和安全需求的放大不是对物质主义匮乏阶段生存和安全需求的再重复，而是后物质主义富裕背景下的相对匮乏。物质主义匮乏背景下的引发的政治态度和行为是对原有制度的推翻和重建，例如希特勒通过魏玛宪法制定的选举制度上台走向独裁和法西斯主义，就是进入体制内以后对原有制度的推翻。虽然在第三波的冲击下，但是目前看来通过选举进入体制内的各种持激进政治态度和思想的政党和组织，更多呈现的是一种孤立主义的传统，而不是对既有制度的推翻。而且奥地利总统大选的结果，也预示这股激进政治态度和行为的风潮，在社会上也不是处于绝对的支配地位，而是呈现底层社会和中间偏上社会的对立状态。实际上，08年以来的金融危机和不知何时结束的欧债危机，加剧了后物质主义匮乏的局势，国家经济状况的恶化和人民福利的消减使得不管什么意识形态的政府均会遭受选民“经

济投票行为”的惩罚¹⁸，工人阶层和中下收入阶层面临“福利缩水”和失业的双重压力，尤其是年轻人容易滋生不安全、失落甚至恐惧感，因而极易受到激进政治思想和态度的煽动和诱惑，从而抒发内心不满和相对的剥夺感。实证研究证明，08年经济危机后青年人因为失业和不安全感的存在，其支持右翼或极右翼的政治态度与行为呈现正相关的关系¹⁹，后物质主义匮乏出现在青年人身上出现。

¹ 李培林等，1995，《中国新时期阶级阶层报告》，辽宁人民出版社，第64-67页；李实、罗楚亮等，2014，《中国收入差距的实证分析》，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第26-31页；李培林、李强、马戎主编，2008，《社会学与中国社会》，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第573-577页。

¹ 李丽梅、陈映芳、李思名，2015，“中国城市户口和居住证制度下的公民身份等级分层”，《南京社会科学》第2期第52-60页。

¹ 张玮，2011，“中国户籍制度改革地方实践的时空演进模式及其启示”，《人口研究》第5期第71-80页。

¹ 国家统计局，2016，《2016年全国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国家统计局网站 <http://www.stats.gov.cn>

¹ 郭秀云，2010，“大城市户籍改革的困境及未来政策走向：以上海为例”，《人口与发展》2010年第6期；郭秀云，2016，“户籍制度功能异化与渐进回归——兼论“后户籍时代”政策议题”，《社会科学》第2期第64-76页。

¹ 李春玲、施芸卿主编，2013，《境遇、态度与社会转型：80后青年的社会学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第35页。

¹ 教育部，2015，《2015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教

¹⁸ Laura Puglisi, “European Party Landscape in Transition.” 14-11-2012, 资料来源: http://www.dbresearch.com/PROD/DBR_INTERNET_EN-PROD/PROD000000000296927/European_party_landscape_in_transition.pdf

¹⁹ 同①, p6.

育部网站 <http://www.moe.gov.cn/>

¹廉思主编, 2009, 《蚁族: 大学毕业生聚居村实录》,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封面夹页。

¹廉思主编, 2013, 《2013 年青年蓝皮书: 中国青年发展报告》,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第 28 页。

¹廉思主编, 2013, 《2013 年青年蓝皮书: 中国青年发展报告》,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第 30 页。

¹ Jennifer Pan and Yiqing Xu, 2015, China' s Ideological Spectrum, MIT Political Science Department Research Paper No. 2015-6.

6. 中国繁荣和发展传统文化事业的新成就

China's new achievements in the prosperity and development of traditional cultural undertakings

史金波, 胡龙西
Shi Jinbo, Hu Ronxi

中国是具有五千年文明、历史悠久的国家，拥有很多珍贵的传统文化遗产，有大量的文物古迹，有卷帙浩繁的古代文献典籍，还有很多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些优秀传统文化负载着中华民族的历史和文明，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和传承意义。

中国历来重视传统文化。自中国共产党的第十八次代表大会以来，更加重视对传统文化的保护和繁荣发展。

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系统梳理传统文化资源，让收藏在禁宫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他在中国共产党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做的报告中更强调指出要“加强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这是对从事传统文化的科学论述，也是对传统文化专业工作者的热情期待，给传统文化工作以巨大鼓舞和推动。

一、文物普查和保护工作的新进展

文物是国家不可再生的文化资源。文物普查是国情国力调查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确保国家历史文化遗产安全的重要措施,是中国文化遗产保护的重要基础工作。

中国国第一次全国文物普查从 1956 年开始,那时,普查规模小,不规范,没有留下统计数据。第二次全国文物普查自 1981 年秋至 1985 年,其规模和成果均超过第一次,但受资金、技术等制约,仍然有漏查。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在 2007 年 6 月至 2011 年 12 月,与前两次普查相比,此次普查规模大、涵盖内容丰富,信息网络、数码相机、GPS 卫星定位仪等现代科技手段运用其中。普查成果将会更加丰富、真实。

近年来,中国又开展了第一次全国可移动文物普查,从 2012 年 10 月开始,2016 年 12 月结束。目的是通过普查摸清可移动文物家底和现状,全面掌握和科学评价我国文物资源情况和价值,健全文物登录备案机制和文物保护体系,加大文物保护力度,保障文物安全,进一步促进文物资源整合利用,丰富公共文化服务内容,有效发挥文物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总体布局的积极作用。

截至 2016 年 10 月 31 日,普查统计的全国国有可移动文物共计 1 亿多件/套,其中按照普查统一标准登录文物完整信息的为 2660 万件/套,实际数量 64,073,178 件。全国共登录珍贵文物 3,85 万多件,其中一级文物近 22 万件,二级文物 55 万件,三级文物 3,00 多万件。此次普查取得了重大成果,掌握了全国国有可移动文物资源总体情况,新发现一批重要文物,建立文物资源数据库和文物身份证制度,健全国家文物资源调查管理机制,全面夯实文物基础工作,初步建立可移动文物社会服务和共享机制。

二、古籍保护工作的新成就

中国至少有 3 千多年的文字历史，形成了大量的古籍文献。中国历来重视古籍的整理和保护工作。

2007 年 1 月中国国务院办公厅下达《关于进一步加强古籍保护工作的意见》，由文化部牵头，随即建立了全国古籍保护中心，并成立了全国古籍保护工作专家委员会。随后在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建立古籍保护中心，按计划开展古籍保护标准。当年文化部派出督导组分头到各地检查古籍保护中心成立及计划落实工作。

古籍保护工作主要是全面开展古籍普查登记工作；建立《国家珍贵古籍名录》，形成完善的古籍保护制度；改善古籍保管条件，命名全国古籍重点保护单位；加快古籍修复，提高古籍修复水平；加强古籍整理、出版和研究水平。

就其中一项重要举措是评选和建立全国珍贵古籍名录。截止 2016 年，已在全国范围内评选了 5 批珍贵古籍，其中既有大量汉文典籍，也有多种少数民族文字古籍。全部共评审出国家珍贵古籍 12274 种，先后由国务院公布，并以图录的形式分 5 次出版《国家珍贵古籍名录图录》。这些具有代表性的古籍展示出中国几千年的优秀历史文化。

2017 年 9 月文化部发布《“十三五”时期全国古籍保护工作规划》，这是中国古籍保护工作方面的首个五年规划。到 2020 年，中国的古籍保护工作将有更大发展，更多成就。

三、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新收获

源远流长的历史使中国继承了一份十分宝贵的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这些文化遗产是中华民族的宝贵财富，它们也是人类的共同瑰宝。

中国自 1985 年加入世界遗产公约。中国规定每年六月的第二个星期六为“文化遗产日”。至 2017 年 7 月，共有 52 个项目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与意大利并列世界第一。其中世界文化遗产 32 处，世界自然遗

产 12 处，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 4 处，世界文化景观遗产 4 处。

这些年中国做了大量工作，加大了申请世界文化遗产工作的力度。近五年中有 9 项世界文化遗产，还有一些在积极申报当中。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多民族国家，中国的《世界遗产名录》中有反映中华民族多民族文化的遗产。如**长城**，是人类文明史上最伟大的建筑工程，建于 2000 多年前，后联成万里长城。**大运河**，开凿于 1600 多年前，是世界建造时间最早、使用最久、空间跨度最大的人工运河，是中国东部平原上的伟大水利建筑工程。**甘肃敦煌莫高窟**，是一处由建筑、绘画、雕塑组成的博大精深的综合艺术殿堂，是世界上现存规模最宏大、保存最完好的佛教艺术宝库，被誉为“东方艺术明珠”。**故宫**，为明、清两代的皇宫，有 24 位皇帝相继在此登基执政，至今已近 600 年，是世界上现存规模最大、最完整的古代木构建筑群。

有的反映出不同民族的文化特点，如**西藏的布达拉宫**，始建于公元 7 世纪，是藏王松赞干布为远嫁西藏的唐朝文成公主而建，是达赖喇嘛生活起居和政治活动的场所。**高句丽王城、王陵及贵族墓葬**，反映出历史上存在了 705 年的高句丽少数民族在这里留下了大量的历史遗迹。**云南丽江古城**，是历史悠久和文化灿烂的名城，也是中国罕见的保存相当完好的少数民族古城。**中国土司遗址**展示出湖南、湖北、贵州多民族地区的“土司”的行政与生活中心聚落遗存，展现了中国中央政权与地方族群在民族文化遗产和国家认同方面的人类价值观交流。**云南红河哈尼梯田**，总面积约 100 万亩，是哈尼族人 1300 多年来生生不息地“雕刻”的山水田园风光画，表现出哈尼族地区农田种植和管理的特点。

在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的过程中，中国从中央到地方政府及有关部门十分重视，对遗址精心保护，恢复原貌，搜

集资料, 认真研究, 严密论证, 使已经申报成功和准备申报的遗产都得到很好的维护。

近年来, 随着中国“一带一路”战略的提出, 有关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的遗产申报更加受到重视。2014年**丝绸之路: 起始段和天山廊道的路网**, 由中国、哈萨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联合申报成功, 线路跨度近5000公里, 沿线包括代表性遗迹共33处。世界遗产委员会认为, 丝绸之路是东西方之间融合、交流和对话之路, 近两千年以来为人类的共同繁荣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2017年厦门鼓浪屿成果入选《世界遗产名录》。鼓浪屿现存有931座展现本土和国际不同风格的历史建筑、园林和自然景观、历史道路网络, 体现了现代人居理念和当地传统文化的融合。世界遗产委员会认为, 鼓浪屿是中国在全球化发展的早期阶段实现现代化的一个见证, 具有文化多样性特征和现代生活品质。

四、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新传承

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定义: 非物质文化遗产指被各群体、团体、有时为个人所视为其文化遗产的各种实践、表演、表现形式、知识体系和技能及其有关的工具、实物、工艺品和文化场所。包括以下方面: 1、口头传统和表现形式, 包括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媒介的语言; 2、表演艺术; 3、社会实践、仪式、节庆活动; 4、有关自然界和宇宙的知识和实践; 5、传统手工艺。

自从2005年开始, 中国已建立起从县级、市级到省级、再到国家级的四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 现审批通过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已经达到了1372项。其中, 中国已有39个项目跻身世界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项目总数位居世界第一。其中, 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31项, 急需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7项, 非物质文化遗产优秀实践名册1项。因为中国历史悠久、幅员辽阔、民族众多, 非

遗项目分布广泛，仍有很多非遗项目已经或者濒临失传，需要我们进一步进行有效的保护和传承。

中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十分丰富，表现出中华民族文化的灿烂多姿。其中有表现中原地区汉族文化的，如京剧、昆曲、中国古琴艺术、中国蚕桑丝织技艺、安徽宣纸等，还有很多表现各少数民族文化遗产的，如新疆维吾尔木卡姆艺术、蒙古族长调民歌、贵州侗族大歌、《格萨尔》史诗、青海热贡艺术、藏戏、新疆《玛纳斯》、蒙古族呼麦、朝鲜族农乐舞、羌年、黎族传统纺染织绣技艺。

总之，中国近些年加大了对传统文化遗产的保护力度，进一步增强了文化自信，促进了传统文化事业的进一步繁荣和发展。

7. 多维分化的城市社区 基于 CSS 和 CGSS 全国抽样调查数 据的分析

Multidimensional Differentiation
of Urban Communities

肖林
Xiao Lin

摘要：社区是社会的微观缩影。中国社会转型期，社区随着市场化、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发生了明显的分化。不同类型的城市社区在空间形态、产权关系、人口结构、组织方式、阶层地位、邻里关系以及社区参与等多个维度上表现出明显的差异，这主要是由阶层分化和社会流动造成的，同时也仍然受到单位、城乡户籍等传统体制因素的影响。因此，社区分化与阶层分化密切相关，但又不能简单等同。不同类型城市社区的多样性是社区发展和治理的客观基础。

关键词：城市社区、社区类型、多维分化

从社会-空间辩证法 (socio-spatial dialectic) 来看, 社会主体与空间结构之间是相互影响的。随着城市化、市场化进程的加快, 社会分化与社区分化、社会不平等与空间不平等密切地交织在一起。城市社区在空间形态、房屋产权、人口结构、组织方式、社区参与等方面出现明显分化, 形成多种类型的社区。影响城市社区类型的主要因素包括: 地理位置 (内城或郊区)、居民的社会经济特征 (阶层、移民、族群)、国家干预程度 (保障住房制度、城市规划、治理方式) 和房地产市场力量等。

国内社区研究有些是回应城市社会学中关于传统“共同体”是“失落” (community lost)、“存续” (community saved) 抑或“解放” (community liberated) 的理论争论, 有些则围绕着“社区阶层化”、“居住空间分异”或“居住隔离”等相关概念探讨社会分层与社区分化之间的关系。中国的社区类型与阶层分化密切相关但又不局限于此, 还与单位制、户籍制度、土地与住房制度改革、人口流动、城市改造与扩张等因素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在现实中, 城市社区的具体类型复杂多样。不同类型社区的公共事务性质、组织和动员方式、所拥有的资源等均有所不同, 国家、市场和社会三者在其中的关系也有很大差别。

目前几乎没有全国范围内以社区为研究对象的抽样调查, 政府统计数据也仅限于对社区自治组织、社区服务设施等数量的简单统计。我们利用“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 (Chinese Social Survey, CSS) 2015 年度数据 (社区问卷) 以及“中国综合社会调查” (Chinese General Social Survey, CGSS) 2012、2013 年度数据 (家庭问卷) 进行初步的统计分析 (样本分布见表 1、2), 并用社区中抽样居民个体数据的均值来近似代表该社区的集体属性。由于两个调查的侧重内容有所不同, 我们将两者结合起来互为补充, 对城市社区类型做一简单“素描”。

在这两项全国抽样调查中, 城市社区类型被分为六种:

即：（1）未经改造的老城区（“街坊型社区”）；（2）单一或混合的单位社区（简称“单位社区”）；（3）保障性住房社区（简称“保障房社区”）；（4）普通商品房小区（简称“商品房社区”）；（5）别墅区或高级住宅区（简称“别墅区”）；（6）新近由农村社区转变过来的城市社区（村改居、村居合并或“城中村”，简称“农转城社区”），这六类社区大致上反映了市场化和城市化过程带来的社区变迁。此外，（7）农村（村庄）作为城市社区的参照。当然，这种分类也是简化了的，现实情况更为复杂。现实中的“社区”是国家治理的微观单元，其边界（辖区）是由地方政府划定的，某一具体社区可能是以上述之一或为主，也可能是多种类型的混合。

表 1 CSS 全国抽样调查社区类型样本分布（社区问卷）

2015 年	次 数	百 分比
未经改造的老城区（街坊型社区）	46	9.8
单一或混合的单位社区	33	7
保障性住房社区	3	0.6
普通商品房小区	65	13.9
别墅区或高级住宅区	1	0.2
新近由农村社区转变过来的城市社区	37	7.9
农村	268	57.1
其他	1	0.2
总计	454	96.8

表 2 CGSS 全国抽样调查社区类型的样本分布（家庭问

卷)²⁰

	2012年		2013年	
	次数	百分比	次数	百分比
未经改造的老城区(街坊型社区)	1902	16.2	1817	16.1
单一或混合的单位社区	1077	9.2	1255	11.1
保障性住房社区	68	0.6	117	1
普通商品房小区	2630	22.4	2563	22.7
别墅区或高级住宅区	115	1	59	0.5
新近由农村社区转变过来的城市社区	1020	8.7	1003	8.9
农村	4862	41.3	4402	38.9
其他	91	0.8	95	0.8
总计	11765	100	11310	100

一、社区人口规模和人口结构差别

总体来看,各类型城市社区平均人口规模比较接近但内部差别很大。人口流动对社区人口结构产生重要影响。农转城社区、单位社区和街坊社区的常住人口数均超过了户籍人口数,且农转城社区的外来流动人口平均比例最高,商品房社区和单位社区的流动人口比例也较高,但其构成有所不同。就人口老龄化程度而言,街坊型社区和单位社区的老年人口比例最高,同时低保户家庭的比例也较高。社区人口结构的不同造成社区居民在公共服务和商业服务需求上的明显差异。

以2015年CSS社区调查结果来看,不同类型城市社区

²⁰ 由于保障性住房社区和别墅区或高级住宅区的样本量很少,这两种类型的统计数据仅有参考意义n。

的总人口均值相差不大, 平均水平大约在 9000-11000 人之间。其中, 房地产市场上的商品房小区总人口均值和中位数都是最多的(表 3)。但具体的城市社区总人口相差很大, 规模最小的城市社区仅 530 人, 是新近由农村转变过来的城市社区。人口最多的城市社区是商品房小区, 达 8 万人。这种社区的人口实际上已经相当于一个小城镇或小城市的规模, 其治理难度和复杂程度可想而知。

表 3 不同类型社区的居民人口规模

社区类型	总人口均值	中位数	最小值	最大值
街坊型社区	9862.3	7514	1357	52819
单位社区	9135.5	8500	2110	19837
商品房小区	10972.6	8989	1986	80024
农转城社区	9438.3	5718	530	27172
农村	2888.2	2444	85	10050

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人口流动显著地影响着社区人口结构, 这主要体现在外来流动人口占社区总人口的比例上(表 4 和图 1)。在新近由农村社区转变过来的城市社区中, 外来流动人口的平均比例为 58.4%, 这在各类城市社区中为最高。事实上, 在“城中村”或村改居社区中外来人口往往多于甚至数倍于本地户籍人口, 这是由于本地农民自建出租房或者拆迁后获得多套安置住房, 普遍存在着“出租经济”和以此为生的“食利阶层”。此外, 街坊型社区和商品房小区外来流动人口的平均比例较为接近, 前者为 30.1%, 后者为 28.9%; 但这两类社区在房屋质量和租金上高低有别, 流动人口的构成因而会有所区别。单位社区的流动人口平均比例相对较低, 为 18%。

表 4 不同类型社区的人口结构

社区类型	户籍人口		常住人口		外来流动人口	
	均值 (人)	比例 (%)	均值 (人)	比例 (%)	均值 (人)	比例 (%)
街坊型社区	6824.8	69.2	7422.2	75.3	2971.0	30.1
单位社区	6584.7	72.1	7192.4	78.7	1644.1	18.0
商品房小区	8325.6	75.9	7785.3	71.0	3170.3	28.9
农转城社区	5402.3	57.2	7948.2	84.2	5511.9	58.4
农村	2699.4	93.5	2453.2	84.9	275.5	9.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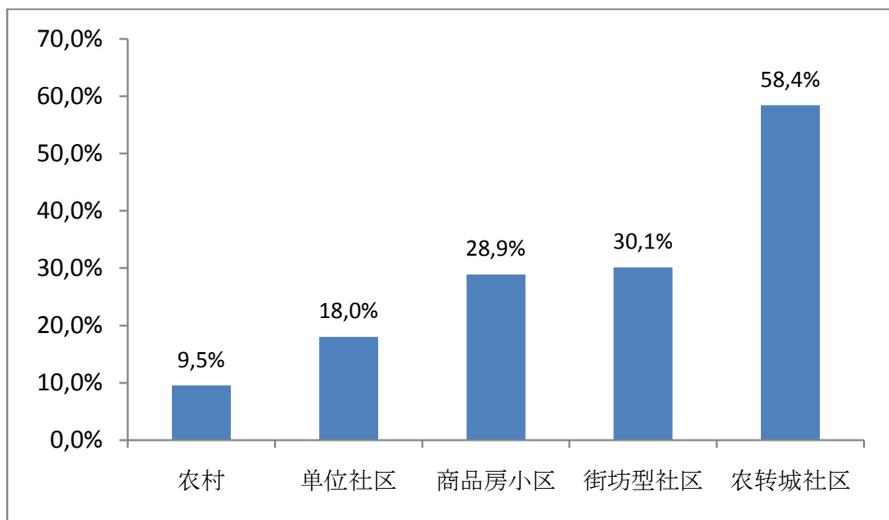


图 1 不同类型社区的外来流动人口比例

就社区的老年人口比例而言（表 5），保障性住房社区的老齡化程度最高，但其样本量过小很可能存在抽样误差。

街坊型社区和单位社区常住居民中 60 岁及以上人口的平均比例均接近 15%，商品房小区的比例略低，为 13.6%，新近由农村转变来的城市社区比例最低（农村除外），为 10.8%，原因在于一方面大量外来流动人口的平均年龄较低，另一方面当地青壮年村民得益于城市化而无须外出打工。

表 5 不同类型社区常住人口中老年人比例（%）

社区类型	60 岁及以上人口比例	70 岁及以上人口比例
街坊型社区	14.47	6.77
单位社区	14.95	7.27
保障房社区	18.48	11.68
商品房社区	13.62	6.08
农转城社区	10.82	4.64
农村	18.82	7.17

2015 年 CSS 社区调查数据显示，领取最低生活保障的家庭户数占社区总户数的比例也有着明显的差别（表 6）。保障性住房社区的低保户比例最高，为 11.8%，原因之一是某些保障性住房（如廉租房）的申请条件往往是和最低生活保障联系在一起的。街坊型社区和单位社区中的低保家庭户比例均接近 5%。商品房小区的低保户比例最低，仅为 3%。

表 6 不同类型社区的低保家庭户数比例

社区类型	数量（个）	总户数均值（户）	低保家庭户数均值（户）	低保户比例（%）
街坊型社区	40	3798.0	183.9	4.8
单位社区	29	3550.8	173.1	4.9
保障房社区	3	1215.3	143.3	11.8
商品房小区	61	3532.7	104.7	3.0

农转城社区	32	2152.4	85.3	4.0
农村	240	755.2	71.0	9.4

二、社区组织上的差别

除了依照法律而普遍建立的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居民委员会和村民委员会²¹）之外，其他类型的社区组织状况也反映了不同类型城市社区间的基本差异，最明显的差异体现在市场型的物业服务企业和自治型的业主委员会的比例上。

物业服务企业是根据市场契约为全体业主提供物业服务的企业，业主委员会是基于物权对小区内物业公共事务进行管理的业主自治组织。这两者均是城市住房体制改革和房地产市场发展的产物。很显然，普通商品小区的物业公司和业委会覆盖比例²²是最高的，分别为 86.2%和 71.9%（表 7）。需要指出的是，以商品房小区为统计单位来看，业委会成立比例实际上是很低的（在大城市的比例大约为 30%左右）。

此外，单位社区物业服务的市场化程度相对也较高，物业公司覆盖率为 72.7%，明显高于街坊型社区和保障房社区的 66.7%。而街坊型社区内部的住房产权较为复杂，包括公房、传统私房和新型商品房，因此物业公司和业委会的比例都比较低（66.7%和 56.8%）。保障性住房社区中由于一部分是无产权住房（廉租房、公租房），没有成立业委会的可能，因此业委会比例只有 33.3%。物业公司和业委会比例最低的是新近从农村转变来的城市社区，分别只有 58.3%和 31.4%。在这类转型社区中，有些物业服务的功能仍然是由原村委会或村集体经济组织来承担。

²¹ 到 2014 年底为止，全国共有城市社区居委会 96693 个，农村村民委员会 585451 个。

²² CSS 社区问卷是针对的是社区居委会而不是物业小区的。一个社区的辖区范围内往往有多个物业小区，有些商品房小区的户数规模较大，此时则单独成立社区居委会。

表 7 不同类型社区的各类组织状况 (均值)

	物业管理公司	业主委员会	居民志愿者组织	居民文体组织	备案的社区民间组织
	(%)	(%)	(%)	(%)	(个)
街坊型社区	66.7	56.8	80.0	81.8	3.11
单位社区	72.7	57.6	81.8	90.9	1.55
保障房社区	66.7	33.3	66.7	66.7	0.67
商品房小区	86.2	71.9	85.9	81.3	3.72
农转城社区	58.3	31.4	57.1	72.7	1.86

从在村(居)委会备案的社区民间组织来看,仍然是商品房小区的数量最多,平均有 3.72 个;其次为街坊型社区的 3.11 个;由农村转变而来的城市社区和单位社区的平均数量都比较少,分别为 1.86 和 1.55 个;保障房社区最少仅 0.67 个。这些社区民间组织在内容上大多以文体兴趣活动为主,兼有少量的志愿性和公益类社区组织,在街坊型社区和单位社区中其成员以老年人为主。在商品房小区中,其兴趣活动内容更为广泛些,也不乏中青年居民的参与。

三、社区服务设施与服务项目的差异

总体而言,普通商品房小区商业和公共服务配套设施与项目最为完善,单位社区和街坊型社区的服务机构和设施

相对欠缺。在居（村）委会开展的服务项目上，街坊型社区更侧重于养老服务，单位社区更侧重于就业服务，商品房社区则侧重于知识类服务。

在 CSS 社区问卷调查中，询问了辖区内是否有两类机构或设施：一类是商业性的，包括便利店（小商店/小卖部）、超级市场、百货商场、农贸市场、银行/信用社；一类是公共性的，包括社区（村）医院/医疗服务站/卫生室/诊所、幼儿园、小学、体育健身场所、老年活动室、图书室（馆）、公园等。我们将“有”与“没有”分别赋值 1 和 0 分，加总计算该社区在设施上的总分（最低 0 分，最高 12 分），以得分均值来大致衡量其在社区服务设施上的差别（图 2）。可见，商品房社区的服务机构 / 设施总分均值最高（9.57），且标准偏差最小（1.881），说明其内部一致性也较高；其次为新近由农村转变来的城市社区（9.35），但其标准偏差最大（2.581），说明其内部的差异较大。街坊型社区和单位社区的总分均值比较接近（8.73 和 8.6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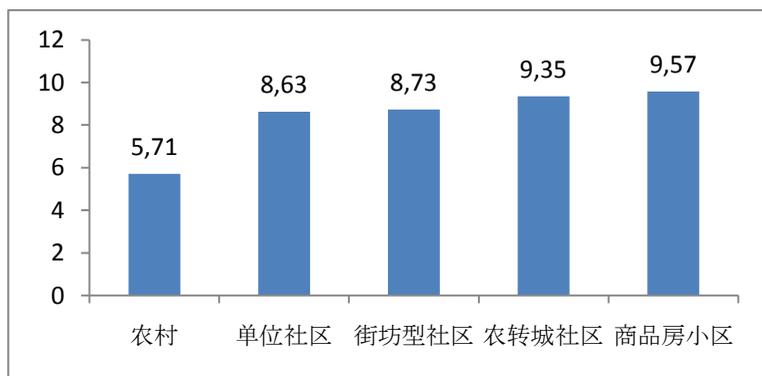


图 2 不同类型社区的服务机构与设施数量

不同类型城市社区居民服务需求存在着差异化的特点。就村（居）委会开展的社区服务项目而言（表 8），街坊型社区在居家养老和就业服务方面开展的比较普遍（52.3%和

68.9%)，在老年助餐服务上较为突出(20.9%)；单位社区则在提供就业服务上比较普遍(75%)；而由农村转变来的城市社区在各项服务提供上均为最少。在其它服务提供上，商品房小区的比例最高(18.4%)，其中包括了法律、科普、青少年等服务项目；街坊型社区也开展了诸如残疾人、职业培训等其它服务项目(9.7%)。

表 8 不同类型社区村(居)委会开展服务项目情况

	居家养 老服务 (%)	老年助 餐服务 (%)	社区就 业服务 (%)	课后托 管服务 (%)	其它服 务 (%)
街坊型社区	52.3	20.9	68.9	25.0	9.7
单位社区	45.2	10.0	75.0	26.7	5.0
商品房社区	50.8	15.6	73.8	23.1	18.4
农转城社区	42.9	8.8	50.0	11.8	3.7

四、 社区居民的经济社会地位/阶层差别

总体来看，不同类型社区的居民在经济社会地位上存在着明显的差别。这意味着经济社会地位相近的居民在空间上相对集中居住，构成社区分化的阶层基础。社会分层与空间分层彼此交织在一起，一方面形成社区的阶层化趋势；但另一方面，社区类型又不完全等同于阶层分化，某些类型社区如单位社区、农转城社区的内部异质性更高些。

从客观(教育、收入、房产、社会保障)和主观指标(阶层和群体身份认同)的测量上，别墅区居民都是经济社会地位最高的，具有典型的“精英”色彩；其次为商品房小区居民，以比较典型的中产和白领阶层为主。街坊型社区在各项客观经济指标上均低于单位社区(甚至有些指标也低于农转城社区)，且更缺乏社会保障，呈现出典型的平民化和底层社会特征。单位型社区的阶层认同与街坊型社区居民接

近,但在其他身份认同上又有所区别,其内部构成相对复杂些,高社会地位和低社会地位成员都有。保障房社区的情况也比较复杂,其不同指标之间存在着或高或低的差异,其形成过程是市场因素和政策因素的结合。农转城社区在教育程度、阶层和群体身份认同上比较低,但在财产性指标上(房产)并不算低,高于单位社区和街坊型社区的均值。

从社区居民所受的最高教育水平来看,两次调查结果的分布情况比较接近(表9)。其中,农转城社区居民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的比例最高,街坊型社区居民的这一比例明显多于单位社区;商品房小区居民受教育水平明显高于其他类型社区,且有超过1/3的居民是大专及以上学历。

表9 不同类型社区居民教育程度分布(%)

	初中及以下		高中及相当 (含职 高、中专、技 校)		大专及以上	
	2012 年	2013 年	2012 年	2013 年	2012 年	2013 年
街坊型社区	58.6	55.8	22.8	25.8	18.6	18.4
单位社区	41.4	48.5	31.5	24.8	27.1	26.7
保障房社区 ²³	55.9	35.9	30.9	19.7	13.2	44.4
商品房小区 ²⁴	35.9	39.4	28.6	26.5	35.5	34.1
别墅区	24.3	41.7	23.5	25.0	52.2	33.3

²³ 保障性住房社区和别墅区的样本量很少,前后两年调查的数据差异较大。

²⁴ 同上。

农转城社区	72.1	73.0	18.6	16.3	9.3	10.7
农村	88.4	88.9	9.2	8.7	2.3	2.4

从居民个人全年总收入来看, 不同类型社区的均值水平高低顺序与平均教育程度的高低顺序基本一致, 从别墅区、商品房小区、单位社区、街坊型社区、保障房社区到农转城社区依次降低(图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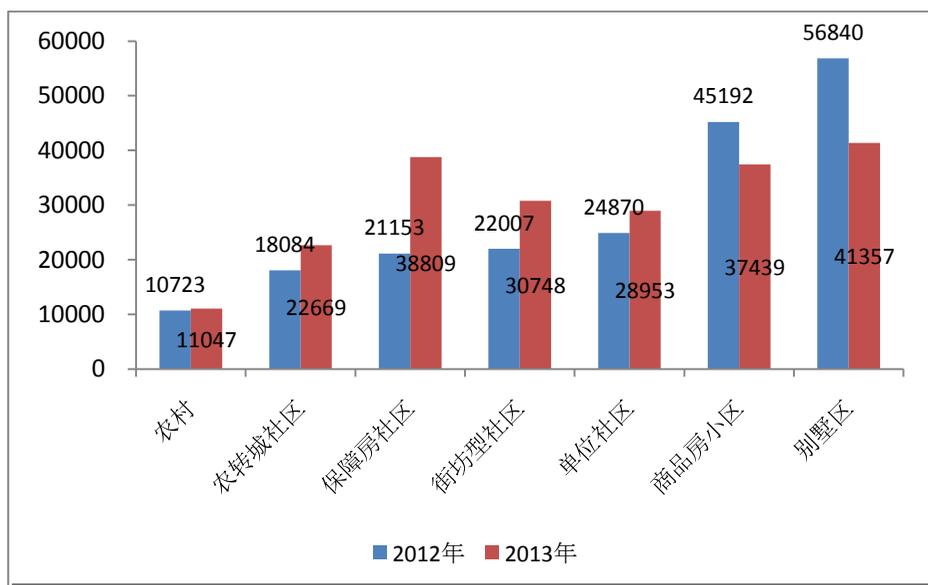


图3 不同类型社区居民的个人全年总收入均值²⁵

房产是最主要的家庭财产, 也是衡量家庭经济状况最重要的指标。以2012年CGSS数据的房产数量为例(图5), 所有样本的家庭拥有房产均值为1.11套, 其中居住在别墅区或高级住宅区的家庭平均拥有1.49套房产, 是各种类型

²⁵ 当年调查数据反映的是上一年度的全年收入。

社区中最多的；商品房小区的家庭其次，平均拥有 1.12 套房产；街坊型社区的家庭平均只拥有 0.99 套房产，为各类型社区中最低值；单位社区家庭的平均房产略高些（1.04 套）。比较特殊的是保障性住房社区，家庭拥有房产 2012 年调查数据为 1.07 而 2011 年数据为 0.99 套，这可能是由样本的随机误差造成的，也说明有一小部分并不符合条件的家庭进入了住房保障体系。如果考虑房产的位置和质量因素，不同社区家庭的平均房产价值差距显然会更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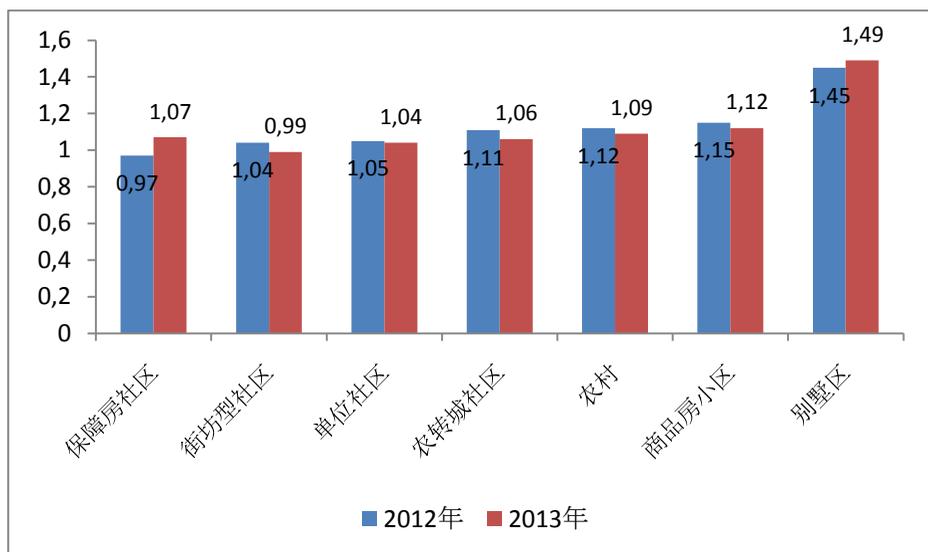


图 5 不同类型社区的居民家庭拥有房产套数均值

2012 年调查数据显示，全国城乡家庭小汽车平均拥有率为 13.8%²⁶。相对而言，别墅区和高级居住区家庭的小汽车拥有率最高（45.8%），远远高于其他类型社区；其次仍然是商品房小区的家庭（23.8%）。比较特殊的还是保障性住房社区，其家庭小汽车拥有率高达 33.3%，这再次印证了一

²⁶ 根据公安部的数据，到 2014 年底，全国每百户家庭拥有 25 辆私家车。

部分经济状况比较好的家庭被纳入了住房保障体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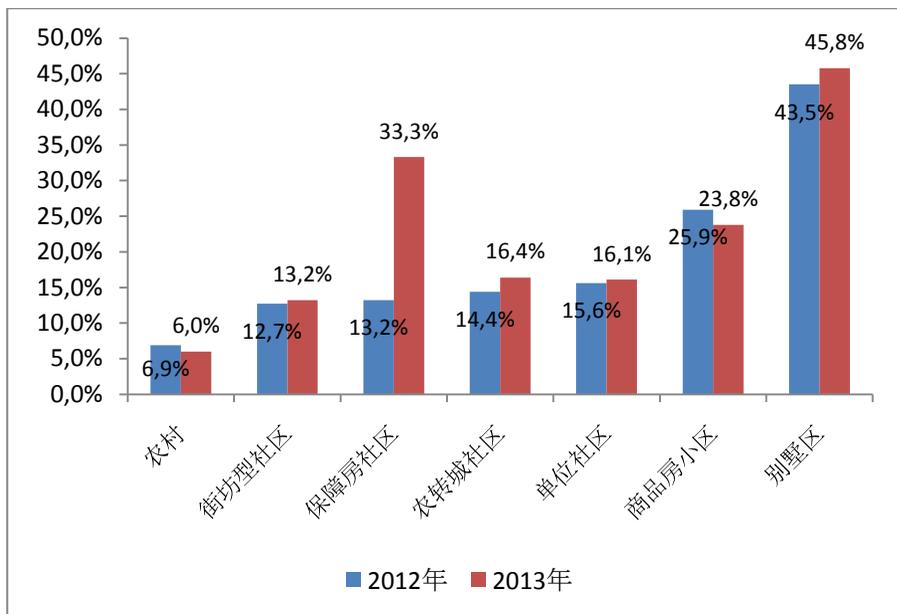


图 6 不同类型社区的居民家庭小汽车拥有率

在所有城乡社区类型中，新近由农村社区转变过来的城市社区中居民没有参加基本医疗和养老保险的比例最高，分别是 16.2% 和 37.4%，部分原因在于这类社区混合居住着当地农村居民和外来流动人口。农村社区居民参加商业医疗和养老保险的比例最低，分别为 3.1% 和 2.5%（表 10）。

在城市社区类型中，未经过改造的老城区居民没有参加基本医疗和养老保险的比例最高（16.1% 和 35.4%），同时参加商业性医疗和养老保险的比例最低（6.6% 和 4.6%）。这说明有相当一部分的老城区居民缺乏社会保障，既没有被纳入国家主导的社会保障体系之内，自身也没有能力加入市场化的社会保险体系。形成对比的是，别墅区或高级住宅区的居民没有参加基本医疗和养老保险的比例最低，同时参加商

业性医疗和养老保险的比例最高。

表 10 不同类型社区居民社会保障情况 (2013 年)

	城乡基本 医疗保险 ²⁷	城乡基本 养老保险	商业性 医疗保险	商业性 养老保险
	没参加 (%)	没参加 (%)	参加 (%)	参加 (%)
街坊型社区	16.1	35.4	6.6	4.6
单位社区	12.3	28.0	10.0	6.7
保障房社区	12.2	25.2	24.3	11.2
商品房小区	12.7	23.6	14.1	10.9
别墅区	6.9	20.3	27.1	28.8
农转城社区	16.2	37.4	8.4	5.8
农村	6.4	32.4	3.1	2.5

就社区居民的主观阶层认同而言（“10”分代表最顶层，“1”分代表最底层），别墅区居民的阶层认同最高，其次为商品房小区居民的阶层认同，而农村居民的社会阶层认同最低。值得注意的是，（单一或混合的）单位社区以及街坊型社区（未经改造老城区）居民的阶层认同也比较低，和由农村转变的城市社区居民的得分很接近。

²⁷ 包括了城市基本医疗保险/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公费医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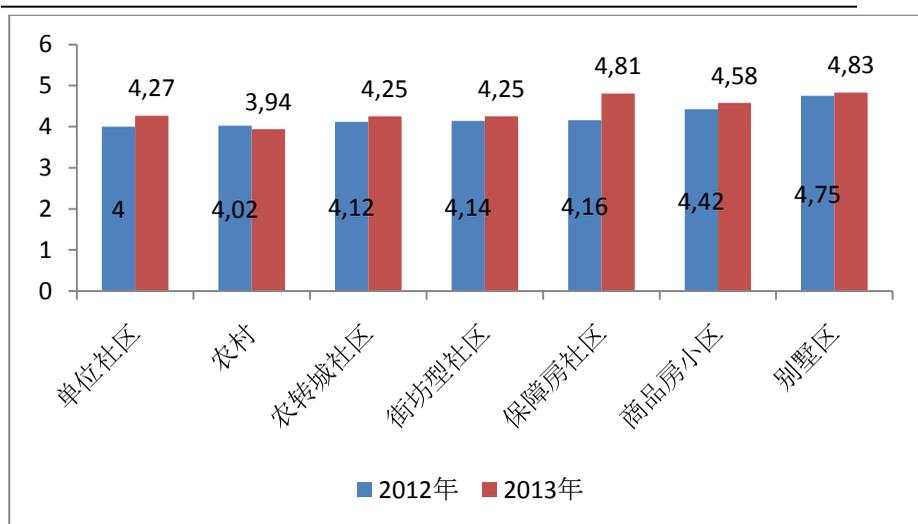


图 7 不同类型社区居民的主观阶层认同得分均值

CGSS2013 年调查问卷中询问了被访者自我认同的群体身份，均为二元划分的问题，包括“富人”/“穷人”、“领导、干部”/“群众”、“有产者”/“无产者”、“管理者”/“被管理者”、“高学历者”/“低学历者”、“白领阶层”/“工人阶层”以及“城里人”/“乡下人”。

数据显示（表 11），别墅区居民显示出明显的“精英”身份认同（富人、领导、有产者、管理者）。而商品房小区居民在高学历者、白领阶层上的认同比例较高，是比较典型的城市中产社区。而街坊型社区则在“底层”身份的认同上（穷人、低学历者、被管理者等）比例均是数一数二的，是带有明显底层色彩的典型平民社区。值得注意的是，（单一或混合的）单位社区居民在领导干部和管理者这两类群体上的认同比例均排在第二位，但同时又在穷人、无产者和工人阶层的认同比例上很高，这说明单位社区的性质是复杂的，既有高社会地位者也有低社会地位者，这取决于所在单位本身的性质。

表 11 不同类型社区居民的自我群体身份认同 (%)

	富人	领导/ 干部	有产 者	管理 者	高学 历者	白领 阶层	城里 人
街坊型 社区	2.9	2.7	15.4	7.3	8.7	7.3	53.1
单位社 区	2.1	4.8	18.1	8.9	12.5	7.6	59.3
保障房 社区	4.3	2.6	27.6	5.1	13.8	12.9	64.1
商品房 小区	3.1	3.7	23.2	8.7	17.7	12.3	70.5
别墅区	12.1	6.9	31.0	20.7	20.3	12.1	72.4
农转城 社区	3.6	1.7	14.1	4.7	5.8	4.4	21.6
农村	1.7	1.1	8.2	2.5	1.7	1.6	1.6
说不清 总比例	29.7	3.9	18.5	30.9	16.0	48.2	9.1

五、 居民的社区社会资本差别

总体而言(图 8—12),农村社区仍然保留着典型的传统“共同体”特点,其社区社会资本最高,其次是新近由农村社区转变来的城市社区。这两者由于血缘、地缘等的重合都明显地具有传统“共同体”因素,有亲密的邻里交往和较强的邻里信任和互助,社区社会资本水平高。而在城市社区中,未经改造的老城区和单位社区的邻里交往相对更为密切,虽然受到市场化的冲击,但仍然保留了一定的“熟人社会”色彩。相反,别墅区最为远离这一特征。普通商品房小区在社区社会资本上虽然略高于别墅区,但仍然接近“陌生人社会”,邻里交往和信任感等较弱。这一格局在一定程度上印证了以往研究关于传统“共同体”在城市化和市场化过程中

不断衰落的观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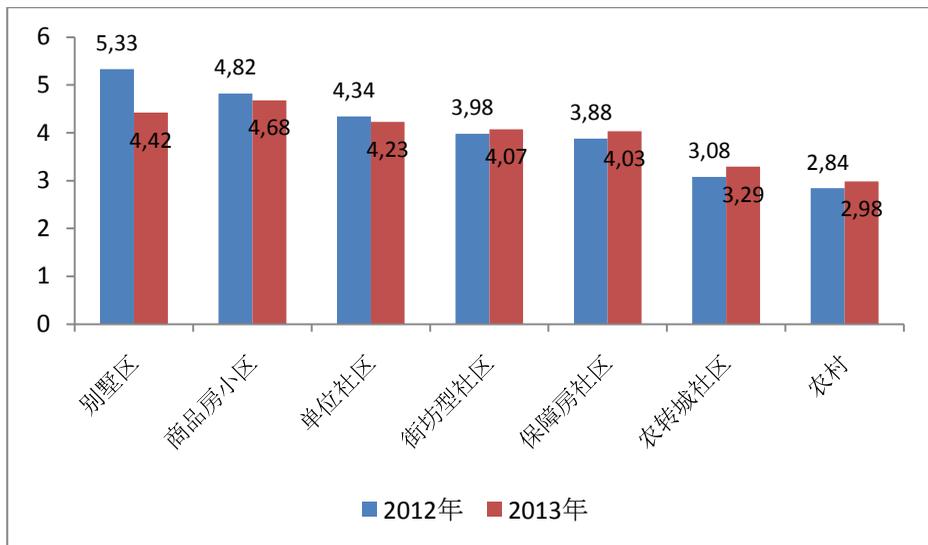


图 8 不同类型社区邻居间社交娱乐频繁程度²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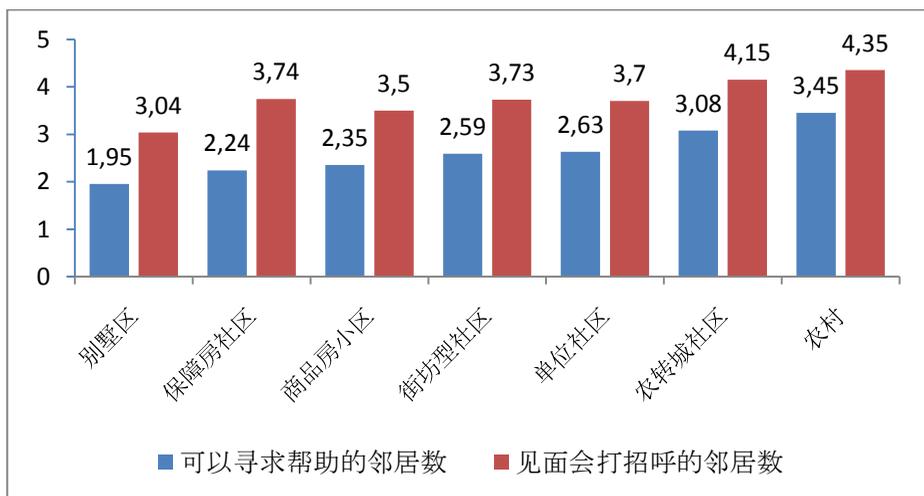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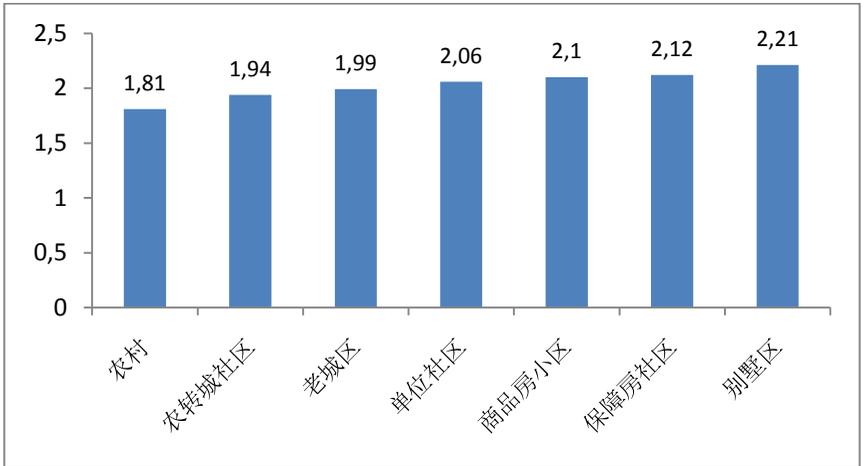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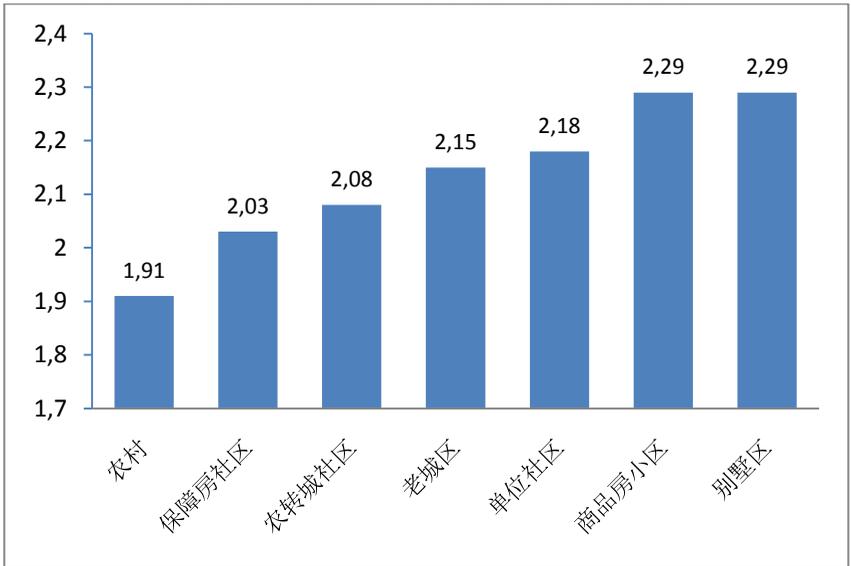


图 9 不同类型社区的邻居间关系强度

²⁸ 从“几乎每天”到“从来不”为1到7分，分值越低表明交往越频繁。

图 10 不同类型社区居民对邻居的信任程度²⁹图 11 不同类型社区的邻里关心程度³⁰

²⁹ 从“非常信任”到“完全不信任”为 1-4 分。

³⁰ 对“邻里是互相关心的”说法从“非常同意”到“非常不同意”为 1-7 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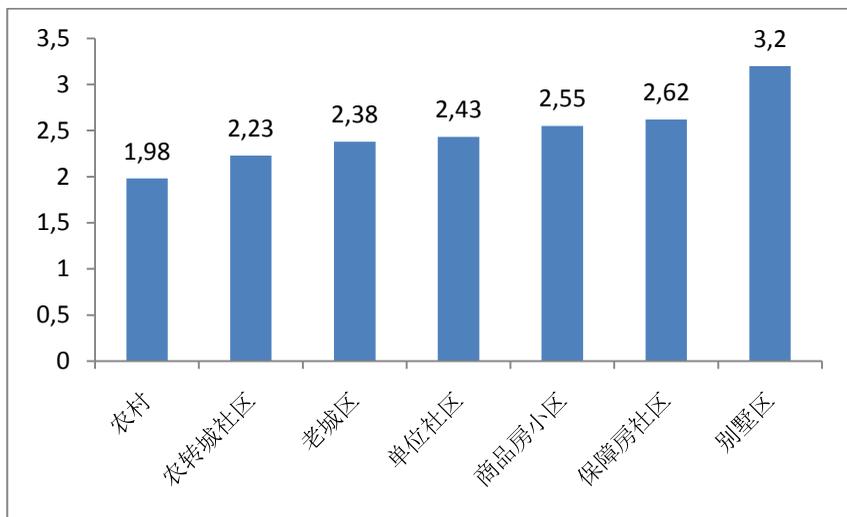


图 12 不同类型社区的邻里互助程度³¹

六、居民社区和社会参与的差别

总体而言，在城市社区中，虽然农转城社区的邻里交往和信任互惠程度最高，但其志愿和公益活动水平却是最低；相反，普通商品房小区传统“共同体”色彩最少，但其志愿和公益精神及行为都最高。此外，商品房小区居民的社会组织化程度也最高；别墅区居民则对本社区的关心度和参与度最低。

就低度政治性的社区参与而言，城市居民参与居委会选举的比例明显低于农村村民参与村委会选举的比例，且农转居社区的投票率仅次于农村（图 13）。村（居）委会选举的投票率是由居民与所在社区的利益相关性决定的。农村社区由于有集体所有的土地作为最重要的共同利益纽带，村委

³¹ 对“当我有需要时，邻居们都很乐意帮忙”说法从“非常同意”到“非常不同意”为 1-7 分。

会的权力涉及到土地承包、出租、集体收益及分配等关系村民切身利益的村庄公共事务，因此村民对选举参与率较高在情理之中。城市社区由于缺乏真正有效的共同利益纽带，投票率低也是必然的。同时，村（居）委会的行政化问题使其偏离了法定的自治组织属性，这也造成社区居民对其信任程度低从而影响投票率。

在其他类型的城市社区中，街坊型社区的投票率相对较高，大约在 35%-40%之间。其原因在于，政府支持下的社区居委会对于部分人群（老年人、低收入者）的需求满足和服务提供上发挥了一定的积极作用，这部分人群通常也是选举投票的主要动员对象。相比之下，商品房小区高收入居民一般对于社区居委会没有什么需求和依赖性，因而投票率也低（约 30%-34%）。他们更看重的是能够维护房产利益的业主委员会选举。投票率同样较低的是单位社区（约 29-35%），原因在于部分社区管理服务和公共设施维护的责任仍然由单位承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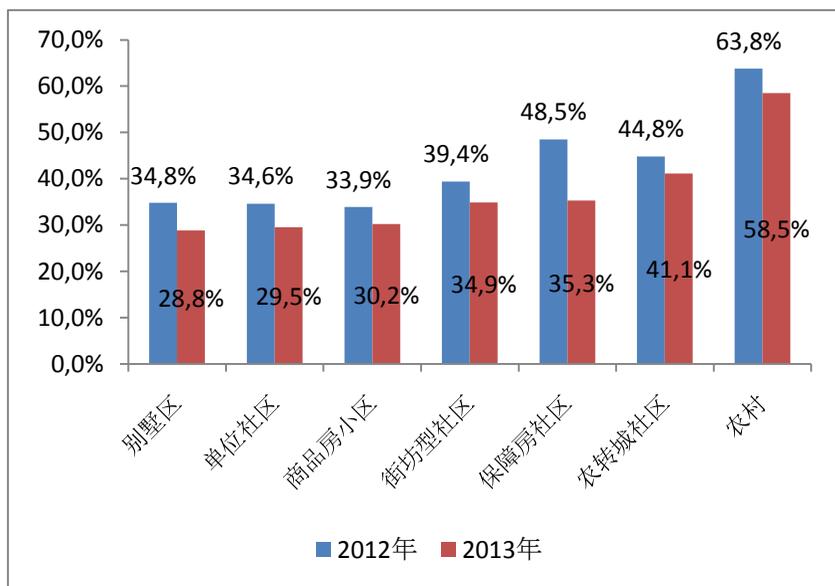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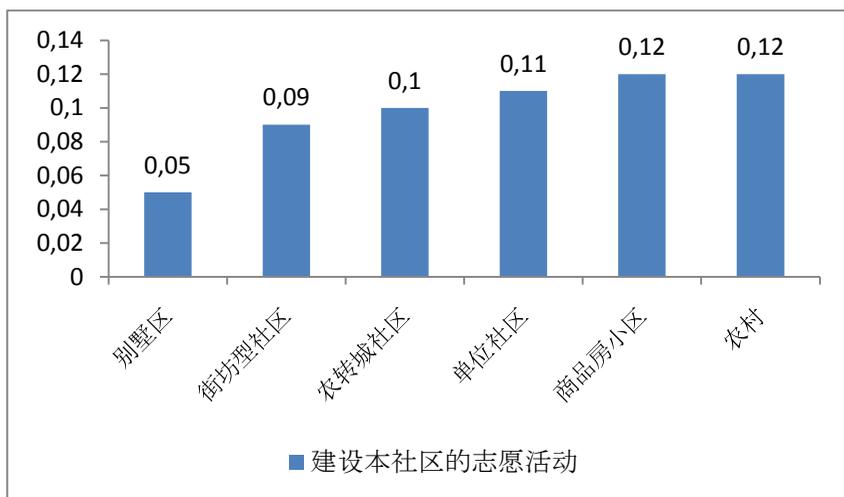


图 13 不同类型社区村（居）委会选举的平均投票率

就涉及公共利益的志愿性活动而言（过去十二个月中），情况有所变化（图 14）。商品房社区居民其参与本社区建设的志愿活动水平却是相对最高的，在帮助弱势群体的志愿活动上也是最高的（图 15）。而别墅区居民参与本社区志愿活动的水平相对最低，但在文化领域（体育文化艺术或学术）志愿活动参与水平上，别墅区明显高于其他类型社区。

图 14 不同类型社区居民参加本社区志愿活动³²

³² 参加过为 1 分，否为 0 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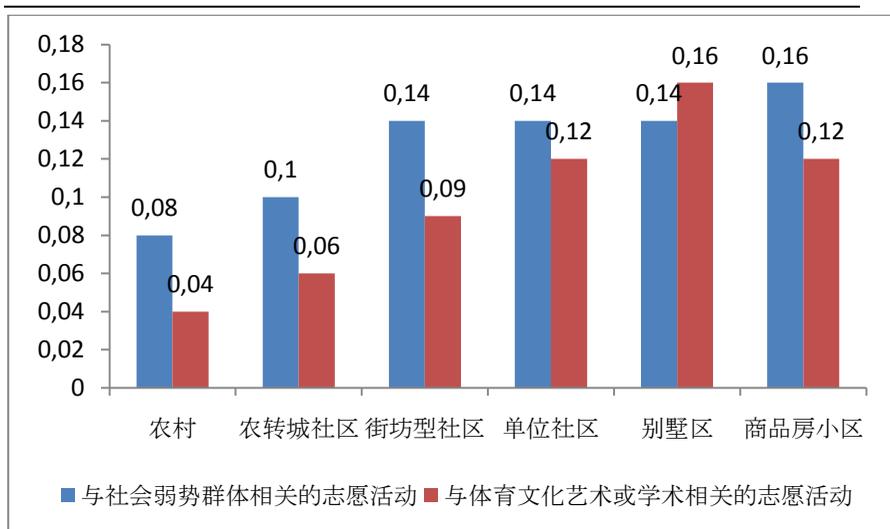


图 15 不同类型社区居民的志愿活动参与水平

总体来看，以货币、实物或所有权等形式社会捐赠比例远高于社会志愿服务活动（图 16）。社会捐助的水平取决于社区居民的经济状况。别墅区和商品房社区平均有 48.2% 和 46.3% 居民进行过社会捐赠。但在社会志愿服务活动中，商品房社区的平均比例则超过别墅区，商品房社区的中产居民成为参与社会公益事业的主力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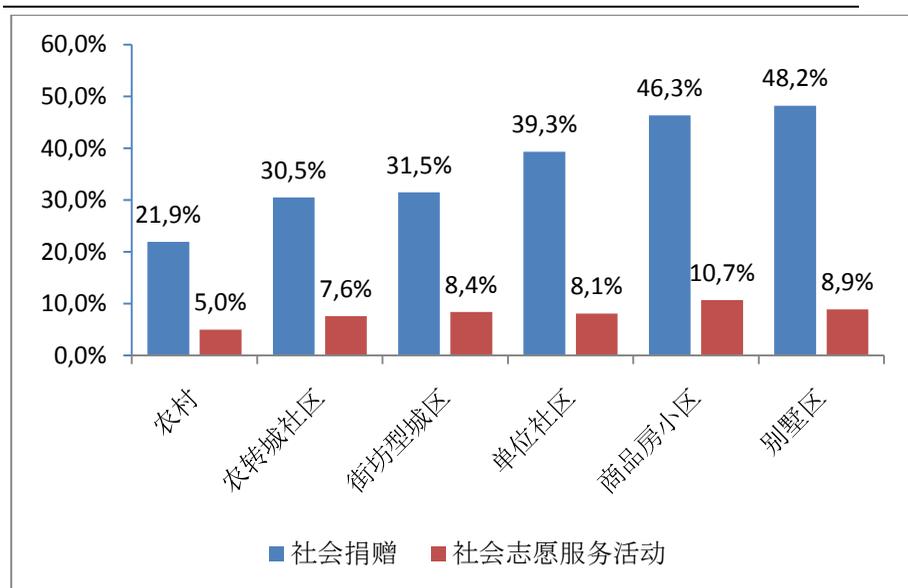


图 16 不同类型社区居民的社会捐赠及社会志愿服务比例 (2012)

从对各种性质组织的积极参与比例上看 (表 12), 商品房小区居民更多地是政治团体、社会公益组织 (志愿者组织、非营利组织)、校友会、职业协会 (专业学会及行业协会) 的成员并且积极参与的平均比例为最高, 这也说明中产阶层在整体上有较高的社会组织化水平。而单位社区在社区组织和工会 (及类似的劳动者组织) 的积极参与比例为最高。街坊型社区的参与水平略高于从农村转变来的城市社区。我们将积极参与各类组织加总计算得分后可以更直观地看出不同类型社区居民的组织化参与水平 (图 17)。

表 12 不同类型社区居民积极参与各种组织的水平
(2012 年)³³

³³ 别除了样本量过少的保障房社区和别墅区, 且未包括比例很低的宗教组织和群众运动/消费者权益组织。

	是该组织成员并且积极参与的比例 (%)						
	政治团体	社区组织	公益/志愿组织	校友会	休闲娱乐团体	会	职业协会/学会
街坊型社区	5.5	3.2	2.5	3.4	3.5	4.8	1.7
单位社区	9.1	5.0	2.8	5.0	4.8	9.7	2.8
商品房小区	10.1	4.4	4.1	5.5	6.0	9.3	3.5
农转城社区	5.2	2.6	1.6	2.2	2.6	4.6	1.6
农村	2.4	1.5	0.8	0.8	1.5%	1.4	0.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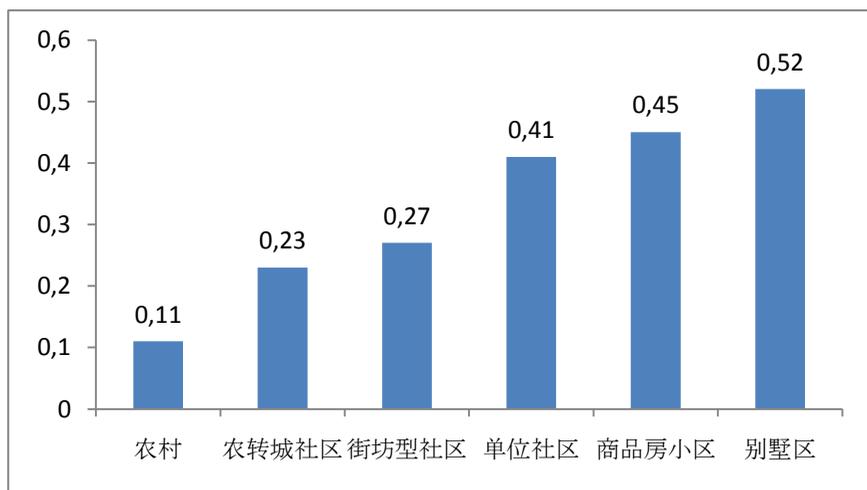


图 17 不同类型社区居民积极参与各种组织的总分 (2012)

七、 总结

分化的社区是社会结构在空间上的一个微观缩影，不同类型城市社区在多个维度上出现分化。社区分化与阶层分

化之间的关系是复杂的,一方面,社区分化在很大程度上是阶层分化的结果,并且反过来强化了阶层分化;另一方面,在某些情况下社区分化又与阶层分化有所不同,由于受到其他因素(如单位制、土地与住房制度和户籍制度)的共同影响,这导致某些类型的社区是不同社会阶层成员的混合体。除了前文的六个基本方面,社区之间的分化还体现在家庭消费模式和生活方式、个人价值观和社会/政治态度、社区集体行动等其他方面,本文对此并未分析。有些分化是由居民个体的经济社会属性差异造成的,社区只是一个统计意义上的单位;有些差异则与社区成员的共同居住生活模式有关。此时,不同类型社区不仅仅是居民经济社会地位分化在空间上的简单而被动的表现,相同或相近社会阶层成员在空间上的聚居反过来会进一步影响到个体的生活机会、社会地位和集体行动。

实际上,在主要几类城市社区类型中,其内部情况也会有较大差别。对单位社区而言,其状况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单位的性质。条件好的单位居住区(如行政机关、公共事业单位或效益好的国有企业)仍然带有较强的“单位制”色彩,居民的经济社会地位、社区配套设施和管理水平相对都比较高。相反,很多国有企业在市场化改革过程中衰落甚至破产,原有的单位社区在很大程度上已经衰败。商品房小区内部也存在着较大的差别而言,其具体状况和项目的开发时间、地段区位、房价水平等因素密切相关。对于具有“亦城亦乡”二元特点的农转城社区而言,其内部差别也比较大,有些村庄已经完成改造转变为城市社区,有些是农民居民混合

当代中国廉政话语建设研究

摘要:本文以福柯“话语即权力”为理论基础,使用话语分析以及语料库的研究方法,分析了2007年—2016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廉政话语的生产机制。结

果表明:政府的廉政话语建设是通过对不同词汇的选择和协作使用来完成的:“反腐败”、“惩处腐败”、“预防腐败”等高频词丛与重复共现的搭配充当了政府“反腐败”政治理念的“话语秩序”,限定了话语构建的边界。

关键词:政府工作报告 廉政建设 话语分析

引言

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以下简称“政府工作报告”)是国务院依据法律规定,由陈述主体(即国务院总理)代表国务院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会议和政治协商会议上向大会主席团、与会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报告本届政府任职期间一个年度的工作情况。³⁴作为一种高度程式化的文本,政府工作报告形成了独特的语言表达模式,国务院作为国家最高行政机关,是最高级别的行政公文的发话者,它所生产的文本具有很高的权威性,发挥着指导行政管理的作用。廉政建设是每一个国家和政府都高度重视的问题,它关乎一个国家和政权的兴衰成败,本文以2007年—2016年政府工作报告问分析文本,结合语料库和话语分析的方法研究我国廉政话语的生产机制。

一、理论基础与分析视角

“话语即权力”是法国哲学家、思想家米歇尔·福柯在1970年就任法兰西学院院士时所发表的职演讲《话语的秩序》中贡献给世界的一个最强隐喻之一,也是最为有力的哲学命题之一。这一命题不再仅仅把话语看成是“纸上苍生”,而且看成是对社会实践主体具有支配性和役使性的强大社会力量。福柯把这种力量定义为“权力”,并由此得到了一个著名的哲学命题:话语即权力。福柯所言的“权力”是指一种渗透于社会实践主体之中的、难以被人们感知,却又无所不在的“支配人体的政治技术”,是一种带有司法之

³⁴ 张振华.2002—2012年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语篇分析[D].PI

立法功能的支配性社会力量。³⁵福柯在《话语的秩序》中提出制约管控话语秩序的三种原则：“话语的外部规则”、“话语的内部规则”、“话语主体的使用规则”，话语通过这些规约来“控制、选择、组织和重新分配”其生产过程形成话语的秩序。话语分析的目的就是揭示话语背后的意识形态、权力制度等社会因素，也就是话语秩序是如何生产的。话语不单纯描述、表达客观世界，其本身也在形塑言说对象，话语与社会事实之间互为建构。

人们日常交际的口语以及生活用语往往一经出口便稍众即逝，对公共社会生活几乎不产生任何影响，而代表着社会主流叙事的文本例如政府工作报告表达的话语文本背后的意识形态以及权利秩序会被不断强化，形成有合法的、对社会生活有影响的权威话语。政府工作报告作为权威话语，对政府行政管理和国家社会治理具有支配性力量，它以话语的形式管约着社会实践主体，构建着社会事实。政府工作报告作为政府机构话语具有独特的体裁特征，是政府运用话语策略构建执政权力的政治技术。

二、语料来源与分析方法

本研究综合运用语料库和话语分析的研究方法对专用语料库进行了数据统计和理论。文中选取 2007 年—2016 年近十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为研究语料，并将其建成专用语料库 (specialised corpus)。本文主要使用 UltraEdit、CorpusWordParser 以及 AntConc 三款软件。文章首先使用 UltraEdit 编辑软件统计专用语料库词语个数为 106636。然后使用国家语委语料库 CorpusWordParser 软件对专用语料库进行了分词处理。最后运用 AntConc3.4.4.0 这个分析工具对这专用语料库进行分析。根据研究需要，我们主要关注了专门语料库中的词频、词丛、搭配及检索等问题，以期通过对这些问题的语料库分析能够窥见政府工作报告中反腐话

³⁵ 王馥芳. 话语“威权”主要源自制度的保障[N]. 社会科学报, 2013年12月12日第005版

语的生产机制。为了确保语料的典型、全面、真实、客观,所有语料均来自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门户网站。

三、语料分析与政府工作报告中反腐话语体系生产机制

根据本文研究的内容,选取“腐败”为主题词在AntConc 中进行关键词检索,与主题词“腐败”共现的词丛与搭配如表 3-1:

序号	词丛	频率
1	反 腐败	13
2	预防 腐败	6
3	惩处 腐败	3
4	反对 腐败	2
5	查处 腐败	2
6	严惩 腐败	1
7	任何 腐败	1
8	惩治 腐败	1
9	执法 腐败	1
10	贪污 腐败	1
11	铲除 腐败	1
12	防治 腐败	1

图 3-1

词汇是语言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语言使用中,词汇选择不仅帮助使用者表达思想,也帮助他们构筑话语理念”。

³⁶Flowerdew 认为,词汇重复和模式化是政治家表明其关注点及由此产生的话语模式的一种最具系统性的方式。³⁷词汇的

³⁶ 优泽顺、陈建平: 话语秩序与对外政策构建: 对《政府工作报告》的词汇变化分析[J].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学报.第 20 卷第 2 期

³⁷ Flowerdew, J.: Identity politics and Hong Kong's return to Chinese sovereignty: Analysing the discourse of Hong Kong's first Chief Executive Discourse&society,1997,p254

重复是建构语料主题最明显的方式³⁸。在政府报告中,与主题词“腐败”反复高频共现搭配的词丛显示了政府对腐败问题决策中关注的焦点与政策取向,图 3-1 中与主题词“腐败”共现次数最高的搭配为“反腐败”以及相似词“反对腐败”,在 10 年政府工作报告中出现 15 次。图 3-1 中出现与主题词“腐败”共现频率次高的搭配为“惩处腐败”、“查处腐败”、“惩治腐败”、“严惩腐败”、“铲除腐败”,这些相似词搭配在 10 年政府工作报告中出现 8 次。其次,图 3-1 中与主题词“腐败”高频共现的词丛搭配为“预防腐败”和“防治腐败”在 10 年政府工作报告中出现 7 次。我们选取“反腐败”、“惩处腐败”和“预防腐败”三组高频出现的词丛作为分析对象进行进一步检索分析。

1. 突出“反腐”话语焦点,确立“反腐”话语边界

政府用反复高频的话语搭配“反腐败”确立了对于“腐败”问题的话语焦点。国家政府机关作为权力话语言说者,用“反腐败”表达出政府自身以及社会对腐败现象的排斥,确立自己与腐败现象呈现“对立面”的角色。图 3-2 清晰展示了与“反腐败”共现的搭配。

序号	词丛	搭配
1	反 腐败	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深入推进,开展治理商业贿赂专项工作
2	反 腐败	三是依法规范行政行为,深入开展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完善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
3	反 腐败	坚持不懈地开展反腐败斗争和加强政风建设,治理商业贿赂工作
4	反 腐败	加强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以规范制度和权利为核心

³⁸Flowerdew, J.: Identity politics and Hong Kong's return to Chinese sovereignty: Analysing the discourse of Hong Kong's first Chief Executive
Discourse&society,1997,p152

5	反 腐 败	要把查处违法违纪大案要案，作为反腐败的重要任务。充分发挥监察、审计部门的
6	反 腐 败	推进政务公开，加强行政问责，坚持不懈地开展反腐败斗争，政府自身建设取得积极进展
7	反 腐 败	加强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建设廉洁的政府是一项持久的
8	反 腐 败	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把查办大要案作为反腐败的重要举措，同时加注重制度建设。
9	反 腐 败	加强廉政建设，深入开展反腐败工作力度，扎实推进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
10	反 腐 败	加大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力度，一批违法违纪分子受到惩处。
11	反 腐 败	行政监察和审计监督力度，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严肃查处违纪违法案件
12	反 腐 败	倡俭治奢，深入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认真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
13	反 腐 败	大力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一批腐败分子受到惩处。
14	反对腐败	要把反腐倡廉建设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旗帜鲜明的反对腐败。坚持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惩防并举、注重预防的方针
15	反对腐败	让人民监督权力，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坚持反对腐败，加强廉政建设，从制度上改变权利过分集中

图 3-2

如图 3-2 所示，“反腐败”在专用语料库中与主题词共现频次最高的搭配，代表了政府对治理腐败的态度与决心，

用重复再现的策略构建了反腐话语的焦点。与“反腐败”共现的“廉政建设”一词在文中一共出现 11 次，树立了反腐败的明确目标即建设廉政。政府工作报告中，修饰“反腐败”的搭配大都是“深入推进、大力推进、深入开展、加强、加大、坚持不懈、坚持”，表明了反腐败举措决心，并把反腐败比喻为一场“斗争”，把“腐败分子”归为要斗争的对象，区隔出“反腐”斗争的边界，让政府工作聚焦。

2. 逐年加大反腐力度，构建法制化反腐话语体系

从历时层面看，政府工作报告中描述对腐败案件的查处力度的词汇从“惩处”到“严惩”再到“惩治”，最终“铲除”，展现出我国政府对反腐力度逐年加大的高压态势。反腐“硬话”通过政府工作报告中一系列的词汇选择而得以构建，深刻揭示出反腐斗争于党于国的重大意义，宣示出祛病疗伤，激浊扬清的坚定决心。

序号	词从	搭配
1	惩处腐败	依法查处违法违规案件和失职渎职的行为，惩处腐败分子
2	惩处腐败	坚决查处腐败案件，依法惩处腐败分子。
3	惩处腐败	加大查处违法违纪案件工作力度，坚决惩处腐败分子
4	查处腐败	坚决查处腐败案件，依法惩处腐败分子。
5	查处腐败	深入推进反腐倡廉制度建设，坚决查处腐败案件，对任何腐败分子都要依法严惩、绝不姑息。
6	严惩腐败	深入开展治理商业贿赂，依法严惩腐败分子，绝不姑息。

7	惩治腐败	坚决查处各类违纪违法案件，严厉惩治腐败分子。
8	铲除腐败	紧紧扎住制度围栏，坚决打掉寻租空间，努力铲除腐败土壤。

图 3-3

如图 3-3 所示，2007—2016 年十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对“腐败”进行检索，出现频率次高表达对腐败问题惩治的相似词丛有八个。从历时层面看，2007 年与反腐共现的搭配“惩处”、“严惩”，2012 年与反腐共现的搭配“惩治”，2015 年与反腐共现的搭配为“铲除”，从“惩处腐败”到“铲除腐败”，我国反腐力度逐年加大，反腐败斗争不断深化，政府对词汇选择的历时变化勾勒出我国政府治理腐败力度逐年深入、不断推进的政治技术。我国政府逐年加大反腐力度的同时，政府工作报告中越来越多的出现“依法惩处”、“依法严惩”等相似词，把制度比喻为“围栏”，用话语构建出法制化的反腐败过程，实现“不能腐”。

3. 惩防并举，注重预防

《建立健全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实施纲要》³⁹提出要坚持“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惩防并举、注重预防”的指导思想，政府工作报告中“预防腐败”“防治腐败”词丛出现 7 次，上文“惩治腐败”词丛出现 8 次，共同构建出政府“惩防并举，注重预防”的反腐话语体系。

序号	词丛	搭配
1	预防腐败	和反腐败斗争，完善教育、制度、监

³⁹中共中央《建立健全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实施纲要》[J]. 理论与当代, 2005,(05)

		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
2	预防腐败	综合治理、惩防并举、中终于当的方针，扎实推进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
3	预防腐败	加强对行政权力运行的监督。要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的各项制度，特别要健全公共资源配置
4	预防腐败	过分集中而又得不到制约的状况，坚决惩治和预防腐败；必须保障人民的民主权力和合法权益
5	预防腐败	加快解决反腐倡廉中的突出问题，扎实推进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把查办大案要案作为反腐败的重要举措
6	预防腐败	加强廉政建设，深入开展反腐败斗争，扎实推进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的各项长期性、基础性工作
	防治腐败	针对腐败现象易发多发的领域和环节，从源头上防治腐败坚决查处腐败案件，依法惩处腐败分子。

图 3-4

“惩治”与“预防腐败”、“防治腐败”共现的搭配出现 6 次，反映出政府“惩防并举，注重预防”的政治理念，政府把预防腐败与惩治腐败放在同等重要的位置。政府在专用语料库中表述预防腐败时选择了“扎实推进”、“坚决”等词汇，构建了反腐工作的长期性与艰巨性，文中与“预防腐败”词从高频搭配的词汇还有“教育”、“制度”和“监督”，共同建构了政府对反腐工作的政治理念与政府的反腐技术。专用语料库对“预防腐败”话语描述进一步构建了政府“不能腐”、“不想腐”的政治理念。

三、结论

如上所述,对2007年—2016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廉政话语的生产机制的分析表明:政府的廉政话语建设是通过对不同词汇的选择和协作使用来完成的:“反腐败”、“惩处腐败”、“预防腐败”等高频词丛与重复共现的搭配充当了政府“反腐败”政治理念的“话语秩序”,限定了话语构建的边界。

参考文献

[1] 张振华. 2002—2012年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语篇分析[D]. P1

[2] 王馥芳. 话语“威权”主要源自制度的保障[N]. 社会科学报, 2013年12月12日第005版

[3] 优泽顺、陈建平: 话语秩序与对外政策构建: 对《政府工作报告》的词汇变化分析[J].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学报. 第20卷第2期

[4] Flowerdew, J.: Identity politics and Hong Kong's return to Chinese sovereignty: Analysing the discourse of Hong Kong's first Chief Executive Discourse&society, 1997, p254

[5] Flowerdew, J.: Identity politics and Hong Kong's return to Chinese sovereignty: Analysing the discourse of Hong Kong's first Chief Executive Discourse&society, 1997, p152

[6] 中共中央: 建立健全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实施纲要[J]. 理论与当代, 2005, (05)

8.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积极推动青海与乌克兰共建 “一带一路”

Build a community of human destiny
Actively promote the construction of "Belt and a Road"

孙发平, 弗拉基米尔
Sun Fuping, Volodymyr Rezanenko

2013 年,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出访中亚和东南亚国家期间, 先后提出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重大倡议。“一带一路”东牵亚太经济圈, 西接欧洲经济圈, 穿越非洲、环连亚欧, 是世界上跨度最长、最具潜力的合作带, 涵盖面积大概有 8000 万平方公里, 惠及地球三分之二以上的人口。“一带一路”倡议顺应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 是推动开放合作、促进和平发展的中国方案, 得到国际社会广泛关注和许多国家积极响应。

“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的 4 年中, 中国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政策沟通不断深化、设施联通不断加强、贸易畅通不断提升、资金融通不断扩大、民心相通不断促进。在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产业投资、资源开发、经贸合作、金融

合作、人文交流、生态保护、海上合作等领域,推进了一批条件成熟的重点合作项目,已同 30 多个国家开展了合作。4 年中,中国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总额超过 3 万亿美元,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累计超过 500 亿美元。中国企业已经在 20 多个国家建设 56 个经贸合作区,为有关国家创造近 11 亿美元税收和 18 万个就业岗位。就资金金融通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已经为“一带一路”建设参与国的 9 个项目提供 17 亿美元贷款,“丝路基金”投资达 40 亿美元。在文化交流方面,中国政府每年向相关国家提供 1 万个政府奖学金名额,在科学、教育、文化、卫生、民间交往等各领域广泛开展合作,各类丝绸之路文化年、旅游年、艺术节、影视桥、研讨会、智库对话等人文合作项目百花纷呈,人员往来频繁,在交流中拉近了心与心的距离。这些都表明,“一带一路”倡议符合各国人民利益,具有广阔前景。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到 2020 年,“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货物贸易总额将达到 19.6 万亿美元,占全球货物贸易总额 38.9%。2017 年 5 月,习近平主席在北京“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发表主旨演讲,提出将“一带一路”建成和平之路、繁荣之路、开放之路、创新之路、文明之路,推动“一带一路”建设行稳致远,迈向更加美好的未来。

青海省位于中国的西北部,属于青藏高原,因境内有青海湖而得名,面积 72 万平方公里,人口 590 万,全省平均海拔在 3000 米以上。青海与甘肃、四川、西藏、新疆毗邻,是联结西藏、新疆与内地的纽带,省会为西宁市。

青海山脉纵横,湖泊众多。昆仑山、祁连山、巴颜喀拉山、阿尼玛卿山、唐古拉山等山脉横亘境内,青海湖是中国最大的内陆咸水湖,柴达木盆地以“聚宝盆”著称于世。全省地貌复杂多样,兼具了青藏高原、内陆干旱盆地和黄土高原的三种地形地貌,汇聚了大陆季风性气候、内陆干旱气候和青藏高原气候的三种气候形态。

自 2013 年,习近平主席提出共建“一带一路”的倡议以后,青海省制定了《“一带一路”建设实施方案》,确定了将青海建成向西开放的战略通道、商贸物流枢纽、重要产业和人文交流基地的发展定位。近年来,一是在政策沟通方面,连续召开了中国(青海)“丝绸之路经济带”经贸合作圆桌会议,与中东、中亚、东南亚和非洲国家使节就经贸往来和文化交流进行了沟通协商。在贸易畅通方面,开通了青海西宁市到比利时安特卫普、青海格尔木市到俄罗斯彼尔姆市的中欧班列,出口商品主要为优质枸杞、地毯、藏毯和盐湖化工等产品。2017 年 6 月召开的“第十八届中国·青海绿色发展投资贸易洽谈会”,国内外 3000 余家企业参会并洽谈合作项目,共签署 353 项合作项目,签约金额超过 1800 亿人民币,项目覆盖装备制造、新能源、新材料、农牧业、化工等多个产业领域。在设施联通方面,青海持续加大战略通道基础设施建设投入力度,初步形成了公路、铁路、民航等多种运输方式共同发展的综合运输框架体系。加强口岸联系,推进青海铁路口岸、电子口岸及其相关配套基础设施和人才队伍建设,为国际陆港建成运营做好准备。在资金融通方面,2016~2017 年,青海省银行业金融机构外汇贷款 21.55 亿美元,为企业办理跨境人民币结算 42.99 亿元,金融对青海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的支持力度不断加强。在民心相通方面,青海省加强与“一带一路”国家间互访交流活动,与相关国家互派留学生开展学习交流,2017 年 7 月召开的西宁城市发展投资洽谈会期间,8 个国家 14 个国际友好城市和友好团队的 51 名市长、企业家、专家代表近 200 人来青海参会考察,就友好城市建设,企业经贸合作等方面的事宜进行了对接。

我们知道,乌克兰历史悠久,人民勤劳勇敢,工业发达,教育体系完善,文化璀璨,尤其是油画、芭蕾、舞蹈和音乐等在国际上享有盛誉,影响中国几代人的名著《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其作者奥斯特洛夫斯基就是乌克兰人。世界闻名的历史文化名城基辅,它被誉为“俄罗斯众城之母”。1992

年中乌两国建立了大使级外交关系后,中乌两国政治关系全面提升,并同中国建立了战略伙伴关系。近年来,中乌两国务实合作机制更加完善,经贸合作发展势头良好,双边关系健康稳步发展。这些都为双方共建“一带一路”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青海矿产资源种类繁多,蕴藏量丰富,其应用价值在中国有突出优势。已探明的 132 种金属和非金属矿产资源中,有 54 种居中国同类储量的前十位、有 23 种居中国前三位、有 10 种居中国的首位,居第一的有钾盐、钠盐、锂矿、镁盐、石棉等。青海的特色优势产业主要有新能源、新型材料、盐化工、有色金属、油气化工、煤化工、装备制造、特种钢、特色纺织、生物产业等。乌克兰是个工业发达的国家,冶金工业、飞机制造、造船工业、化学工业、机床制造、机械制造、能源工业、轻工业都是重要的产业工业,技术力量雄厚。这些都为青海与乌克兰加强合作提供了重要的产业基础,需要我们双方积极创造条件,加强沟通与联系,在投资、技术、贸易方面建立合作关系,推动经济贸易共同增长。

青海国土面积有 72 万平方公里,有可利用天然草场 3300 万公顷,是中国五大牧区之一,盛产藏牦牛、藏系羊、骆驼、山羊等,但耕地面积较少,只有 58 万公顷,占国土总面积的 0.8%,农作物主要有青稞、油菜、蚕豆、豌豆、马铃薯、燕麦、小麦等。乌克兰气候温和、土壤肥沃,2/3 为黑土地,占全世界“黑土带”总面积的 40%,农产品丰富,食品加工业发达,农产品以小麦、向日葵、马铃薯、蔬菜、水果、长纤维亚麻为主,有着“欧洲粮仓”的美誉,是世界上第三大粮食出口国,对中国出口的主要产品为动植物油脂和植物产品。因此,青海与乌克兰在农业、畜牧业和农畜产品加工业方面各有优势,互补性较强,双方可以取长补短,优势互补,加强合作,推动农畜产品贸易往来,前景十分广阔。

青海地处青藏高原,长江、黄河、澜沧江均发源于青海,

被誉为“中华水塔”、“三江之源”，是中国及东南亚地区重要的生态安全屏障。青海的湿地面积达 814 万多公顷，居中国首位。青海湖是中国最大的内陆咸水湖，面积达 4354 平方公里，有 200 多种 30 余万只鸟类栖息繁衍。青海现有三江源国家公园 1 个，青海湖、可可西里、隆宝、孟达天池等国家级生态保护区 5 处，格尔木胡杨林、祁连山、克鲁克湖——托素湖等省级生态保护区 6 处，总面积达 37.59 万平方公里，占全省国土面积的 52.21%。乌克兰生态资源丰富，境内有 100 多条超过 100 公里的河流，主要有第聂伯河、德涅斯特河、多瑙河、杰斯纳河等，还有 2 万多个湖泊。乌克兰森林资源丰富，森林覆盖率达 43%，占全国领土面积的 14%。乌克兰有自然保护区 14 个，地球生物层保护区 3 个，天然国家公园 6 个，面积达 77.19 万公顷。因此，青海与乌克兰在生态保护、环境治理、生态产业发展方面加强双方的合作与联系，相互借鉴其成功的做法与经验，有利于推动生态文明建设，改善各自的生存环境，提高生态环境的良性发育能力，有利于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实现可持续发展。

青海是一个多民族、多宗教省份，除汉族以外，全省世居的少数民族主要有藏族、回族、土族、撒拉族和蒙古族，其人口占全省总人口的 47%。青海的主要宗教有藏传佛教、伊斯兰教、道教、基督教、天主教，其中藏族、蒙古族、土族主要信仰藏传佛教，回族和撒拉族信仰伊斯兰教，部分汉族信仰道教、基督教和天主教，信教群众占全省总人口的 41%。我们了解到，乌克兰也有 130 个少数民族。因此，青海与乌克兰可以共同探讨各民族共同团结进步、共同繁荣发展的有效做法，通过互相学习借鉴，有助于切实维护各民族的团结，推动本地区的社会稳定，为共建“一带一路”营造良好的社会环境。

近年来，随着“一带一路”建设的推进，青海与中亚、南亚国家在文化、教育、旅游等方面的交流不断拓展，人员往来频繁。人文经贸活动的频繁往来为共建“一带一路”营

造了良好的氛围，青海逐渐成为中国与中亚、南亚国家友好往来的重要桥梁和纽带。乌克兰历史悠久，文化灿烂，有1300多个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160多处历史文化古迹。乌克兰教育发达，具有普通教育、职业技术教育、中等专业教育、高等教育等完善的教育体系。乌克兰旅游资源丰富，喀尔巴阡山脉原始山毛榉林、圣安德烈教堂、国家历史博物馆、克米拉米屋、国家艺术博物馆、国家航空博物馆等都是著名的旅游景点。因此，青海与乌克兰应进一步挖掘各自的文化内涵，通过举办国际性文化、教育、体育、旅游以及智库建设和学术研讨等活动，加强各自企业以及相关学者和政府官员之间的交流学习，畅通沟通渠道，创新合作方式，积极开展人文、民间文化交流，发展文化产业，必将有力推动互利共赢的“一带一路”建设。

总之，青海与乌克兰共建“一带一路”有着美好的发展前景，只要我们坚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则，乘势而上、顺势而为，积极搭建合作交流平台，就一定能够推动青海与乌克兰在共建“一带一路”的道路上取得丰硕的成果。

9.

多元共生 和谐发展 - 对青海民族文化发展几点认识

Pluralistic Symbioticism and Harmonious Development
- Understanding of the Development
of Nationality Culture

毛江晖, 伊万·精液师

Mao Jiang Hui, Ivan Semenist

一、尊重民族文化的包容性与多样性，在继承中创新

（一）民族传统文化是少数民族的稳定剂和凝固剂，是一个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重要特征

民族文化是一个民族在长期的社会劳动中创造出来的物质、精神文化的总和。它不仅为各民族在现时代的生存与发展提供了必要的生活方式和文化基础，还构成了各族人民致力于建设和追求的现代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文化是最能体现民族性和区域性的载体，体现着一定民族、一定区域最持久和最本质的活力，它显示出独特的文化特点和精神内涵。

（二）青海民族文化的差异性、多样性、多元性、互动性是良好文化生态的基本特征，是社会稳定与和谐发展的基础

青海省对少数民族优秀文化遗产的保护,彰显的就是这种文化价值观。热贡艺术和联合申报的“花儿”、格萨尔、藏戏入选联合国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品录。全省现有国家级非遗项目 57 项、代表性传承人 38 名,省级非遗项目 93 项、代表性传承人 114 名,“中国民间文化艺术之乡”29 个。

(三) 青海各民族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了各民族共同的价值观

不论是社会的发展还是民族的发展,都离不开文化的推陈出新。从历史上看,每个民族的文化都是处在不断的分化和整合之中,都经历着对社会发展的接受与适应。青海各民族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了各民族共同的价值观,在主流文化中可以称之为“主流价值观”。在当代,各民族文化虽然各有异彩,都有自我认同的传统价值观,也就是“非主流价值观”,即由于传统积淀所负载的本民族的执著与信念。但各民族对主流文化的接受、认知程度越来越高,同质性特征日益凸显。

文化的发展代表着一个民族的进步,它不仅是文化传承的基本条件,而且也是文化创新的标志和文化活力的体现。历史的经验证明,没有哪一个民族可以把自己封闭在传统的文化形态中,而对外界的变化无动于衷。今天的社会现实也在证明,青海各民族正在通过学习和借鉴、改造与创新,逐步形成良性循环的文化自调节机制,依据、凭借自身的传统和特点,采借外来文化形式,在相异文化的交流整合中弘扬各民族优秀文化,在现代化变迁过程中建构起独具特色的文化体系,并成为民族发展的精神支柱,以文化的发展推进民族社会的整体发展。

二、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引领,发展民族先进文化

(一) 发展先进文化,把不适应民族发展进步及人的现代化的价值观进行调整和提升,建立新的价值取向

在继承和借鉴的基础上,发展健康有益文化,把培养人的主体意识、开放意识、创新意识作为民族地区文化建设的重要任务,以促进经济文化的协调发展;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丰富多彩的社会实践中,通过创造性的转换,真正“激活”各民族文化中的优秀成分,使之进一步与时代精神结合在一起,成为充满生机和活力的新的民族精神的有机组成部分。

(二)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引领,关键是如何解决实践层面与民族文化的相契合

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如果不能根植于民族民间大众文化,不能在草根层面培植起生根开花的土壤,那它就有可能成为阳春白雪,让老百姓高不可及。先进文化的倡导和实践,总是在平行中运动而无法交汇。而“文化如水,滋润万物,悄然无声”,文化建设要靠天长日久、日积月累,才能水到渠成。这就要求各级政府要站在“大文化”视角,研究和规划民族文化发展战略,做强做实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实践基础,正确处理继承吸收与发展创新、普及与提高、主旋律与多样化、民族性与现代性的关系,使青海的民族文化既有浓郁的民族特色、地域特色,又有鲜明的时代气息;既高扬主旋律,又彰显多样化。

三、顺应民族语言文字发展规律,推进文化渗透和转换

(一)各民族对本民族语言文字依然钟爱,民族语言文字的作用依然凸显

民族语言文字是民族的精神承载、表达体系,也是民族文化的重要表达和符号。在各种民族文化要素中,语言是一个相对稳定的要素。每个民族都十分热爱自己的语言。党和国家保障各民族都有使用本民族语言文字的自由,并制定了具体的语言文字政策,促进各民族语言文字的发展。青海各民族大杂居、小聚居的特点,以及经济社会发展和民族交往的需要,使得各民族互相学习、使用语言的情况非常普遍,汉语作为国家的通用语言已为少数民族广泛接受。同时,各民族对本民族语言文字依然钟爱,民族语言文字的作用依

然突显,这也是民族能够进一步发展的重要条件。

(二) 母语教育,不仅是民族语言得以传承和发展的需要,同时也是一个个人获得充分发展的必要条件

语言不仅仅是交际的工具,还在记录、表达和传递本民族世代积累起来的文学艺术、宗教信仰、道德规范以及生产经验等方面,承载着民族文化特殊的内涵,是民族延续发展的基础。就此而言,每个民族成员学习和使用本民族语言的过程也是习得民族文化的过程。母语教育,不仅是民族语言得以传承和发展的需要,同时也是一个个人获得充分发展的必要条件。在人的社会化过程中,“本民族语言是最重要、最基本和最有效的社会化工具。只有熟练地习得标准的本民族语言才能被本民族社会所接纳,在民族社会中形成应有的民族性格和气质以及交际能力,并以其鲜明的特点和最大的包容性进一步习得主体民族以及国际社会的语言和文化,形成较强的跨文化交流和交往能力,成为一个立足本民族、面向世界履行一定角色行为的社会人。

(三) 双语教学是以语言为载体的文化接触、交融、传承和发展的的重要途径,是跨文化教育的重要手段

双语教学,不是人们理解的仅是语言工具的选择形式,它也是我国文化内涵的重要构成。从教育学的视角来看,双语教学是以语言为载体的文化接触、交融、传承和发展的的重要途径,是跨文化教育的重要手段。基于语言环境的差异,青海“双语”教学主要采用三种范式:其一,所有学科均采用民族语文授课,同时开设汉语文课;其二,各学科用汉语文授课,同时开设民族语文课;其三,部分课程用汉语文授课,部分课程用民族语文授课(这里的民族语文,主要是藏语文)。

时代变迁、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现实的社会生活越来越离不开通用语。这是社会发展的规律,也是语言自身发展的规律。我们要提倡和鼓励各民族互相学习语言文字,要因人因地区而异各有侧重,使民族语文和汉语文在不同的领域

和范围发挥各自的优势。

结语

文化是一个社会、一个时代重要的精神支柱和价值导向,文化不仅是凝聚人心的有效手段,更是形成地方良好社会风气的风向标。文化所产生的巨大影响力,不仅对一个地区的形象具有重要的展示、塑造作用,同时深深影响着社会的进步和人们的日常生活。文化作为一种“软实力”,它不仅具有明显的存在方式,渗透在社会发展的全过程,而且它主要体现在对人的精神塑造上。基于此,青海民族文化发展的价值选择,就是走向文化自觉。一个民族只有文化自觉,才能做到文化自信和文化自强。所以,文化自觉不仅是一种文化意识,还是文化实践的坐标。如果没有文化自觉,文化的发展创新就无从谈起、无从落实。

“文化自觉”的内涵主要有三点:一是处在一定文化环境中的“人”要有对所处文化的自我意识,要对自己所拥有、所生存的文化状态持有清醒认识;二是在各种异质文化面前,对自己的文化要有“自知之明”,确立主体意识,并能对自身文化进行创造与建设;三是在处理不同文化关系时,要树立“和而不同”的文化观,相互欣赏、学习,将自己的民族文化融入到世界文化体系中,在世界文化体系中找到自己文化的位置与坐标。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青海民族文化的自觉,只有落实到社会民众层面,引起包括社会各界的整个社会价值体系的自觉时,才可能获得其真正的价值实现。以一种自我认知、相互尊重、和谐共处的文化态度来处理与他民族、他文化的关系,并超越自身价值的缺陷,理性应对不同文明的价值差异,开展文化交流,实现文化互补,促进文化和谐。文化自觉根本上是价值观的“自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系,无疑是整个中华民族在文化自觉基础上形成的体现时代特征和精神的先进文化和价值理念,引领着各民族文化的发展方向,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提供更深厚的文化源泉和精神动力。所以,

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引领，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这是青海民族文化发展的价值目标，并最终培育起各美其美、多元共生、和谐发展的文化生态。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

现代的中国社会：新看法 (中乌科学家新研究)

著作责任者：樊平，方宁，何新良，李春玲，马锋，伊
万·精液师，史金波，胡龙西，肖林，孙发平，弗拉基米尔，
毛江晖

现代的中国社会：新看法/毛江晖，孙发平，何星亮，史金
波等/集体专著。- 中文电子出版 2017 年

版次：2017 年 十二月三号

